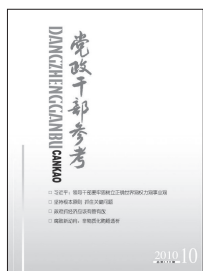


党政干部参考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张 莹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传真 (010) 62808900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 0301 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 元

要论

3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
 权力观事业观

学习与研究

4 坚持根本原则 抓住关键问题
 /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6 再谈“中国特色” / 沈宝祥

高层言论

8 薄熙来：要做大事 不要当大官
 8 卫留成：干部要勇于创新 and 承担责任
 8 张庆黎：以实干行动“领”以实干精神“导”
 9 郭声琨：不让实干者吃亏

经济纵横

10 政府抓经济应该有管有放 / 吴敬琏
 11 阻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大思维误区
 / 李江涛
 13 消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 胡若痴

农业·农村·农民

15 “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
 16 中国耕地质量之忧

反腐倡廉

18 腐败新动向：非物质化贿赂透析 / 李永忠
 20 “小金库”为内部人员牟利已成集体腐败

为政之道

22 百姓和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官” / 王和平
 23 只有真学才能真懂真信真用 / 王国忠

共同关注

25 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 汪玉凯

26 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 / 杨宜勇

28 家庭财富累积影响未来社会结构 / 王天夫

文化教育

29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 周保松

31 缺乏科学精神是缺少科学大师重要原因

/ 杨卫平

观察与思考

33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 / 陆学艺

学员论坛

37 推进和发展党内民主的若干思考 / 田喜荣

人物春秋

39 毛泽东如何研读国学经典 / 卢志丹

环球瞭望

41 霸权之锚——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巡视 / 李因才

44 日本海洋扩张的伸与缩

他山之石

46 美国的人口登记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高剑清 姚彩霞

史海钩沉

48 80年前的台湾雾社起义 / 陈军

最新书摘

50 “中国”：位于中间的国家

健康之友

52 电磁辐射——新的致病源 / 刘国信

数据库

53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11 亿 其生存发展面临

六大问题

54 全国闲置土地 16.95 万亩

54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55 《党政干部参考》载文统计分析

撷英咀华

封二 岁月的眼泪 / 韩传栋

封底 《党政干部参考》征订广告

如有破损、漏页、模糊、影响阅读的，请与本刊编辑部申继红联系调换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署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或文摘均有报酬，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或直接与北京市版权局稿酬收转中心联系。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甲 24 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1823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 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9月1日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强调，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才能使自己变得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也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联，有权必有责。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

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事业顺利时要满怀信心、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遇到曲折和挫折时同样要满怀信心、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不论做何种工作，都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事创业，都是必须做好的光荣事业，都要真正把精力和才干集中和用在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上。他强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事业观，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事业观上陷入误区。不坚持科学发展，即使一时搞得轰轰烈烈，最终也干不出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来。领导干部对待政绩，要坚持实践观点，把求真务实作为实现政绩的基本途径；要坚持群众观点，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历史观点，把科学发展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做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干部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有利契机。各级党组织要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教育引导他们带头学习提高、带头干事创业、带头服务群众、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弘扬正气，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摘自2010年9月1日《新华网》）

坚持根本原则 抓住关键问题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划清这“四个重大界限”，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坚持根本原则，抓住关键问题。

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其中，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与划清其他三个界限之间是“总”与“分”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划清其他三个界限。

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观点。检验人们是否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关键要看其是否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否坚持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否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否坚持唯物辩证法，等等。只有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结合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认清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当前，有人将马克思主义“泛化”，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也有人搬来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企图“改造”、“纠正”、“补充”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年来一些人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却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世界观中立论，主张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否定革命，鼓吹“改良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对于这些颇具迷惑性的思想观点，只有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辨析，才能正本清源、判明是非。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不懈探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此，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继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第三，必须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着力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

进新格局。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应当正确认识世界经济领域一些新的经济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新的经济现象。比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个别西方国家的银行等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国有化”现象。有人据此认为，这些国家也在搞国有制、搞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有化，是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既不是搞社会主义，也决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民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要求全面、具体、历史地对待民主问题。

“三权分立”并非民主政治制度的“楷模”。有人十分推崇西方的“三权分立”，认为它是一种很好的民主政治制度。客观地说，这些人并不了解“三权分立”的实质。以早年英国为例，众议院是选举出来的普通人的议会，参议院是被任命的贵族的议会；贵族为了控制普通人，制定了众议院通过的议案必须再次拿到参议院通过的制度。这一做法被一些西方国家沿袭下来。为了制衡众议院，美国规定，参议院、总统、最高法官可以否决众议院通过的议案。这种制度安排表明，“三权分立”本身也存在许多不民主的地方。实际上，由于自身的缺陷，“三权分立”并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做民主的通用模式，真正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数量很少。

“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不是民主的本质。有人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事实上，许多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分为三步：首先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其次是公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民主是渐进的，如果搞错了顺序，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要求其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结果必然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在民主问题上，如

果我们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必然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一民主具有独特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基层民主上，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需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来维系。在这些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文化。文化是由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哲学等多种因素构成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其核心则是价值观。文化的不同，核心是价值观的不同。不同文化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先进文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而奋斗，引导社会发展进步。腐朽文化形成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导致等级特权、宗法迷信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侵蚀人们的精神世界，危害社会发展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既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坚决抵御腐朽思想文化侵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不仅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历史，而且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历史。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既有优秀文明成果，也有腐朽思想文化。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尺，才能对二者作出区别，才不会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时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一并吸收，在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时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一起否定。

（摘自2010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再谈“中国特色”

沈宝祥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断地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经过31年的实践，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比较具体也比较深刻了。

一、邓小平为什么提“中国特色”

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一是为了抛弃苏联模式。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搬了苏联模式，而实践已经证明，采取这种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成功。他针对苏联模式，提出了“中国特色”。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为了取得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权。苏联一向以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自居，强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他们的一套，否则就给扣上“民族主义”、违背“普遍规律”等大帽子，并横加干涉。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主要是针对苏联而言，告诫他们不要干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特色”的提法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苏联方面的“关注”。1984年6月2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因素》的文章，大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团结一致”，特别讲：“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章说：“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以及社会生产同私人生产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有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首先是削弱集中计划的作用，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私人经济成分的比例。这种‘探索’没有考虑主要的一点，即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首先是动摇社会主义经营的基础。”很明显，这是针对当时我国正在推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针对我国市场趋向的改革。这篇文章进而指责：“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机械地模仿或无视其他国家的经济同样是危险的。”这更是明白地针对“中国特色”而言的。这篇文章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作这

样的负面评价，无疑就是苏共的观点和立场。这就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的一个重要背景。现在，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个重要的背景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特色”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推进。

二、对“中国特色”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强调从基本国情出发，到既强调国情又重视客观规律的过程。

开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作了这样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这是因为，“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而不能成功。在开初，大家都是从这个视角观察考虑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致力于研究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强调，一切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当时，我们提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都是以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深化。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超越国情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了。首先思考的，是市场经济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应不应是商品经济。广东的卓炯等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在热烈的争论中，这个思想和主张逐渐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吸纳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阐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

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文件，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有历史意义。这个文件已经越出了国情的眼界，而是从历史必然性，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提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一段时间内，既有人不赞成商品经济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场经济，怕与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其实，邓小平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的思想逐渐冲破“左”的禁锢，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取得较为广泛的共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特别是商品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原来认为，照搬别国模式，社会主义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适合，在其他所有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由于搞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效果都不理想。因此，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适合不适合国情，更在于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

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主要是同苏联模式，特别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的社会主义（即中国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

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概括地说，我们基本改掉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上。在经济方面，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这些，都是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艰苦探索和创造的成果，我们要十分珍惜。

以上这样的具体的“特”，还可以再列举一些，但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没有建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度、体制等都处在完善和变化的过程中。对此，不能以模式化的眼光看待。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刻的革命。这个转变（或转型）必然是长时期的。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何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走人类文明大道的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一点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四、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

理论上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对于推进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关系很大。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我们有自己独有的东西，如“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大量的东西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只是带有中国自己的某些特点。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特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要十分重视考虑中国的特点，但一定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起来，不能离开普遍性谈特殊性。当前，特别要警惕“中国特殊论”，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反对借鉴和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必然导致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限制人们的眼光和思维，极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摘自2010年9月13日《北京日报》）

薄熙来：

要做大事

不要当大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讲话时说——

人民群众渴望经济发展，渴望繁荣，但也强烈地呼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只讲繁荣与发展，那美国是全球的样板。我们不仅希望发展繁荣，同时要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老百姓既要看你当政者之“能”，看你能不能发展经济；还要看你“公不公”，是否公道正派地行政。社会的发展繁荣与公平正义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西政干什么呢？就是要培养一批学生，专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对那些黑恶分子毫不留情地绳之以法，还老百姓以公平正义。

西政的廉政语录，最有精气神。特别是孙中山先生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大家静下心来琢磨，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场风气腐败，不少人跑官要官，左右逢源，根子就是想当官，想往上爬。如果是想着干大事，而不是想着去当官，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会少得多。

（摘自2010年9月20日《重庆晚报》）

卫留成：

干部要勇于创新

承担责任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最近指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要发展得好，发展得快，最关键的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这个领导班子，除了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还

要具备思想解放，眼界开阔，无私无畏，敢想敢干的素质，并能用心做事，会想会干。私心太重、缩手缩脚的领导干部很难领导发展，用心做事和不用心做事的差别很大。

好的领导班子要有几个层次、几个方面的干部组成，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党委的一把手要有好的思路，眼界开阔，要勇于创新 and 承担责任，要有很强的发展意识和组织领导能力。同时，要有一批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副职来辅助党委一把手，要有一批懂业务、懂技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建言献策的骨干。

海南的领导干部要在胆识、气魄上，不等不靠不要、敢想敢闯敢干、有胆有识、敢于决断、勇于实践，要坚决摒弃循规蹈矩、瞻前顾后、怕担风险的作风。在实干精神上，对认准了的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抓住不放，干不成不罢休。在发展理念上要最大限度地放开、搞活，打破旧的体制、机制。在为官的心态上，要有为发展不怕犯错误、不怕担风险、不怕丢官帽的无私无畏精神，想问题、做事情不是为了求官、保官、升官，要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做事上、放在抓发展上。

（摘自2010年8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张庆黎：

以实干行动“领”

以实干精神“导”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最近在第六批援藏县委书记培训班结业式上说——

一个领导干部，认清“领导”二字的含义非常重要。“领”的实质是先干、先做，用战争年代的话说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导”是“领”的后续和深化，这个过程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概括，是对“领”的升华和提高，是更高层次的“领”。

我们干什么事，都要讲个“实”字。人最宝贵的精神是实干的精神，最重要的行动是实干的行动。作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应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务实首先要人在岗上，岗在心上。援藏县委书记要做到爱岗敬业，就是要确保在藏率、在县率、在岗率，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试想，如果县委书记经常不在西藏、不在县里、不在岗上，那就像种庄稼不到地里一样，是荒了自己的田。

务实要敢干会干。人们期望的是什么样的县委书记？简单地讲就是既忧国为民，又能干事的干部。忧国为民是德，是觉悟；能干事是才，是水平。能干事，包括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还不能惹事。想干事是境界，敢干事是作风，会干事是水平，干成事是目的，不惹事是起码要求。

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要真正干好它，必须脑袋不闲，勤于思考。就是要做到腿勤、嘴勤、手勤、脑勤，白天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讲一讲，晚上写点笔记、过过电影、作些思考。思考是研究、探索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需要熬夜、吃苦，花大心血，把情况搞清楚，把问题搞准确，把关系搞妥当，把措施搞实在。

干工作不能所有的事“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清主次，逐个落实。一个领导到一个新地方任职，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上来就把前任的都否了；二是没过三天就弄出来一大堆新思路。一定要吃透上面的、借鉴外面的、了解历史的、结合自己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忌生搬硬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认真做好结合文章，努力抓好落实工作。

（摘自201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郭声琨：

不让实干者吃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最近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践行“六戒”，转变作风，必须树立戒虚戒浮、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引导大家以实干为荣，把心思花在工作上，把力气下到落实上，把本事用于创业上，决不让那些做人实在、作风实在、干事实实在、业绩实在的实干者吃亏。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必成于实”。推动事业发展，贵在实干。在我们的干部中，有许许多多的实干者，他们甘作“老黄牛”，不事张扬，埋头苦干，吃苦不喊苦，劳累不喊累，干事不挑事，负重不怕重，担责不塞责，而且干的往往是打基础、利长远、惠百姓之事。这些同志，是良好作风的标杆，是广西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是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让他们“吃苦又吃亏，受累又受气，流汗又流泪”。

不让实干者吃亏，根本在于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就会树起一面旗，激励一大批；用错一个人，就会寒了众人心，挫伤一大片。不让实干者吃亏，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科学的态度和制度选人用人。尤其要注重德，把人品、官德、作风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考察，凡是在德方面不及格的人，坚决不用；注重实，以实干来看德才，以实绩来用干部，使实干者脱颖而出；注重民意，给“眼睛向下”、踏实干事、群众公认的“民牌”干部更多的机会，从而使戒虚戒浮、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成为引导干部从政理念、从政行为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双识才的慧眼，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平凡岗位、艰苦地区、急难险重一线，把那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人甄别出来。对实干者要多支持、多保护、多褒奖，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干事、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让他们有为、有位、有舞台。

（摘自2010年8月25日《广西日报》）

政府抓经济应该有管有放

吴敬琏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考虑效率。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得到发挥,这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分工变得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当然,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摘自2010年9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阻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大思维误区

李江涛

现阶段，有三大思维误区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机制转型认识的深化，为未来长期经济趋势基本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偏差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基础。

思维误区之一：国际金融危机根源探索的体内自我论证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在个别宏观经济指标向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经济正在复苏”的观点一度占据主流，然而，由于一阵不和谐的声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再度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不确定性”状态。根据“不确定性”结论，“我国出口形势无法做出研判”的观点开始盛行，进而，国内宏观经济趋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是否真的“不确定”？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探求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开始。当前关于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索是一种体内自我论证过程，即完全在金融系统内部寻求危机爆发的机理，这种思维误区的缺陷在于，它扭曲了“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的基本经济原理，而实际上内含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逻辑——“虚拟经济决定实体经济”。当忽略实体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时，就不可能对世界经济走势得出确定性的结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较长的历史期间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重大演进的周期性规律，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任何国家出现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演进）的初期，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引领的信息产业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国家开始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21世纪初期我国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等，产业资本投资的预期利润率比较高，而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的深入，平均

利润率开始发挥作用，投资预期利润率出现递减趋势，当该轮产业结构重大调整进入尾声时，投资预期利润率落入低谷。资本是逐利的，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同性质的产业结构重大演进周期之间，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大量资本往往涌入虚拟经济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各类衍生工具的刺激下，虚拟经济泡沫往往迅速膨胀。当积累到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时，在某些导火索的刺激下，如国际资本投机资本的冲击，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必然迸裂，并反过来通过消费下滑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由此，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逻辑链条就是在2001年信息产业结构演进周期结束之后，资本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同时在大量过度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推动下和金融监管滞后的影响下，近年来虚拟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并最终破裂。

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周期性重大演进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发达国家经济能否摆脱萧条，取决于它们能不能再次在实体经济领域成功地找到新一轮产业结构重大演进的路径。事实上，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探索，其目的就是如此。

从目前的状况看，受核心技术突破、既有产业格局等多种因素影响，新能源产业难以在短期内承担其重振发达国家经济的重任，尽管在新能源产业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表现尚可。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基本明朗化，即已经落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对此，我国应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思维误区之二：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简单化或抽象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有两个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正在成为

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要件。前者是上世纪末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的最终成果形态；后者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迫于巨大的能源资源环境压力而实施的一种战略性经济模式。

毋庸置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促进其向知识主导型转化，推动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改善，应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主基调。但是，现阶段，一个巨大的思维误区，即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过度简单化或抽象化，正在影响着经济长期增长的进程。过度简单化表现在，人们往往非常随意地把具体经济活动中，一点点知识与技术的增加，一点点能源资源环境的改善，都冠以已经实现知识经济或生态经济目标的美称，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继续低知识化和低技术化，增加了防止生态继续恶化的舆论障碍。过度抽象化表现在，人们经常漠视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预先描绘一幅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宏伟蓝图，为实现该蓝图，跳跃式、大规模地推动发展那些当前并不具备人才、技术、资本等实力的产业，或者过度强调发展那些尽管具有一定资源禀赋优势，但当前并不适宜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产业，造成短期内难以看到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前景。

应该看到，知识和技术比重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义和基本趋势。由于该过程具有“从量变到质变，再从质变到量变”的阶段变化特征，同时人们很难非常精准地预测到未来长期内的重大科技革命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趋势，所以，十分明晰化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内涵和边界是不现实的。而从较短时期看，提高经济活动的知识和技术比重，改善生态环境又是非常紧迫的。因此，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紧迫需求，在可行的范围与程度上加大经济活动的知识化和生态化步伐，是一种比较务实的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宣称已经实现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目标，或者过度拔高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目标而最终难以实现。

思维误区之三：工业化特征把握的“传统化”

我国重化工业化进程刚刚走过了不足十年的历程。根据国际经验，该进程仍将保持十年以上的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工业化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重化工业化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尤其是能源资源环境对工业化的限制性急剧增加。对此，无论怎样指责发达国家忽视历史，要求其承担能源资源环境的历史责任，也无无论在能源资源环境的残酷现实中，发达国家如何无耻，极力逃避自身责任，而把发展中国家置于责任的漩涡，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改良”都势在必行，即对传统的工业化路径赋之以时代新特征。

时至今日，我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已经具有多重复合性特征，即以较高的工业信息化水平，探索符合新型能源资源经济规则和社会规则的重化工业化发展路径。然而，从总体来看，目前不同利益群体、组织之间对于工业化特征的把握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例如，对于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传统化”视角把握区域内工业化的特征，即不受信息化和能源资源规则约束的传统重化工业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各种利益驱动下，他们也不愿意适应工业化特征的改良趋势；即使对于忧患意识更为强烈的中央政府和学术界，往往只有那些国际交流较多的部门或学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认识深刻并有动力推进重化工业化模式的转型。

上述分歧所体现出的思维误区，为“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制造了巨大的思想障碍，为我国承受更大的国际压力、投资挤压消费与传统产业挤压新产业增长点培育空间、削弱现有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思想支持力。

因此，“扬弃”传统工业化理论，构造适应时代背景的具有多重复合性特征的新型工业化路径，一方面应成为新形势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是新形势下工业化探索者、实践者努力的方向。

（摘自2010年8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

消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胡若痴

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内需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内需中消费又比投资更具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且消费需求的波动性相对较小，消费增长的平稳发展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投资和出口波动给经济增长造成的动荡，防止宏观经济猛烈的上升或下降。我国以及世界各国历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大部分时间中要远高于投资，更高于出口。从数据分析来看，消费应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

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

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任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的增长，不能只靠行政命令和政府行为的大量投资和消费，必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因此必须正确引导不同阶层的消费，深挖民间资本的潜力。我国社会结构已趋于定型化，消费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也出现了明显的阶层

化。城乡贫困阶层是弱势群体，社会应建立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的消费。城乡体力半体力劳动阶层，其消费水平较低，主要偏重于吃穿等较基础的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追求较少。中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阶层，该阶层比例越大，社会稳定系数越高，社会进步越快。因此，各国都将中产阶级视为消费的主要群体。我国正在努力提高中产阶级的比例。中产阶层人士主要来自于从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中小企业主、管理阶层、以及脑力劳动者、中层领导干部。该阶层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无论是对物质消费水平还是精神消费水平的要求都较高。而中国“第三波投资移民高潮”的兴起，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在教育、文化、旅游、网络、休闲娱乐、保险、时尚商品等精神和物质消费上提高水平、创新内容；如何从法律上保障发展的权益、提供良好的环境；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高福利体制；如何将中产阶级从“房奴”、“孩奴”中解放出来，提高其消费能力、激发其旺盛的其它消费需要等。另外，富人阶层的海外旅游扫货消费、“中国海外看房团”等超强购买力的“中国购买”现象，以及在中国境内苦于缺乏其它投资消费途径、而大肆狂置房产的情况，引人高度关注。我们应国货当自强，努力塑造中国商品的国际品牌形象，提高品牌价值，以吸引这部分群体的消费目光；鼓励富人阶层参与社会活动，进行慈善性消费与投资；适当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以低税负吸引富人阶层把资产留在中国，发展相应的财富管理业务；建立与富人阶层消费相适应的高端产业，拓宽各种投资和消费渠道、领域，以吸引其在国内进行奢侈性消费，减少民间财富的外流，使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此外，还应重视各种层次、各种类型劳动者的人才培养途径和机制，在经济、制度、公共物品等各方面为之提供生活、工作、学习、发展的保障，为经济增长随时提供充足的劳动生力军。

（摘自2010年9月6日《中国改革报》）

“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谈“十二五”时期城乡一体化改革

最近，在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针对目前各地正在进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区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工商资本取代农户成为农村经营主体，短期内一哄而上地大规模消灭村庄，这样的方式实现的城市化，将带来严重的三农问题，因此，城乡一体化改革必须在法制框架下进行。

陈锡文表示，土地作为基本财富，在改革中起到很大作用。“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所有现代国家对土地的管理都坚持用土管制，用规划来控制土地使用，一切土地使用必须按规划走，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正受到严重挑战。有些地方简单地认为把农村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才是城镇化。”陈锡文表示，目前各地用地违反规划的事很多，对保持18亿亩耕地造成了很大障碍。

◆◆ 不透明的用地阻碍宏观调控

2003年，国务院提出了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即缩小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安置标准。陈锡文表示，农村用地大量转化为非农用地，既关系农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建设用地的使用，不仅要按规划走，还要按年度获得指标。例如，去年630万亩，今年640万亩。这么做是为了经济结构的平衡，因为放出多少地，可以测算需要多少贷款、钢材、水泥，以及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有多大。可是陈锡文发现，不少地方以各种理由不纳入国家用地计划，不按照规划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他表示，这因此使得国家宏观统计难以实现，宏观调控难以实现，进而

经济结构调整也难以实现。

“建设用地数据不透明、总量无法把握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宏观调控的。显然，规范建设用地市场，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重要意义。”陈锡文表示。

◆◆ 让农民生产自己的产品

陈锡文表示，农业的经营方式问题，与土地有关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土地问题。“其实放眼全球，无论规模大小，找不出多少国家的农业不是家庭经营的，一定都是以农户为主体。但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很多人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出路，认为家庭经营已经过时，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是主流，很多地方出现引导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替代农户经营的潮流。”他认为，土地改革作为探索无不可，但作为制度要慎重。

陈锡文说，理论界认为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才开始推进土地流转，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他表示，中央1984年就提出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后每当涉及这个问题时，都是这个观点。“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自然的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在什么程度上能做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需要非常理性。

陈锡文认为，中央并不提倡工商企业大规模进入农地，鼓励企业下乡主要是开展农产品加工销售，而不是鼓励他们长期直接租用农地。“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不是一农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效率问题，如果是后者，那办法多得是，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他说。

他认为，工商企业大规模租用（下转第19页）

中国耕地质量之忧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紧缺，由此导致粮食安全与环境问题突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张维理博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了解土壤及土壤相关资源与环境状况，准确掌握全国土壤肥力、环境质量状况仍将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未来 20 年农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和农业最重要的资源，农田生态系统还是消解城乡生活、生产废弃物、维持碳氮硫磷等物质循环最重要的基础。我国耕地资源紧缺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少（仅 1.43 亩），而且由于人口多，许多不宜农用的土壤被开垦为农田，耕地土壤整体质量偏低，中低产耕地土壤占 65%。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坦言：未来 20 年中国农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由中国工程院牵头组织的“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农业科技领域课题组的研究认为，近 50 年来，中国农业走过了一条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道路，未来农业发展，必将面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技术薄弱、技术创新不足等困境困扰，既要保证 16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又要实现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难度相当巨大。而人口增长和消费增加的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我国未来 20 年农业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没有质量的数量同样令人担忧”

耕地问题是农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虽然我国提出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但未来耕地面积减少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

趋势，这种趋势只能减缓而不能遏制，18 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人口耕地不到 0.1 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不到发达国家的 1/4，只有美国的 1/6、阿根廷的 1/9、加拿大的 1/14。

“保护耕地数量固然重要，但没有质量的数量同样令人担忧。如果保持 18 亿亩耕地数量不变，但分布状态和质量状况由集中、连片、优质逐步向破碎、零星、劣质转变，累积起来的破坏效应将十分严重，而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一位资深院士向记者强调。

国土资源部 2009 年 12 月 24 日发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成果《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 9.80 等，等别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的 10 至 15 等地占调查与评定总面积的 57% 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 1000 公斤/亩的耕地仅占 6.09%。中国耕地质量总体明显偏低。

有专家证实说，我国每年城镇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高等级耕地，而补充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水热、区位、地形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总体质量不高。“高等级耕地流失过快，补充耕地等级偏低，以次充好的情况很严重，耕地质量总体下降，已严重影响到我国耕地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经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层

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我国各主要农区，由于长期使用浅耕机械，同时不重视施用和科学使用有机肥料，农田活土层已明显变浅，作物根系难以下扎。因为缺少适合农民使用的科学施肥技术，全国各大农区化肥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问题依然普遍。在约占全国农田面积20%的集约化种植农区，氮磷肥料严重超高量使用，单季作物化肥纯养分用量平均为569~2000kg/hm²，氮肥利用率仅为10%左右。因养分供应极度失衡，作物病虫害严重，农田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导致这部分我国生产条件最好的耕地土壤盐害、酸化严重、结构破坏、农药残留、土壤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土壤生物性状、健康功能严重衰退，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山东、云南等省份一些蔬菜、花卉产区的农民不得不采取深翻底土、客土甚至更换地块等方式减缓产量下降。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农村耕地从集体大面积经营转化为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耕地管理单元变小，使用权变更频繁，对农田基本建设忽视，许多地区农田沟渠失修，尽管国家投资完成了包括河道改造在内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由于农田沟渠老化，难以有效进行农田的防旱排涝。

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

分析显示，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2000~2008年9年中，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增长了35%，粮食单产净增加为315公斤/公顷。其他类型分别为：“减肥高增产”类型，如德国、以色列、荷兰，在2000~2006年7年中氮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下降9%~26%，粮食单产增加约500公斤/公顷；“减肥低增产”类型，如韩国、丹麦、英国、法国在氮化肥用量下降17%~33%条件下粮食单产为较低增产（同期增加为211~296公斤/公顷）；“增肥高增产”类型，如越南、孟加拉、埃及、智利等，同期化肥用量增加了20%~69%，粮食单产净增加超过400公斤/公顷，最高达1173公斤/公顷。

污染土壤占耕地面积的1/5

张维理认为，近年来高化肥、农药用量的蔬菜、花卉、水果作物播种面积的高速增长、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在为广大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面源污染是指在农田、村镇与城区场地上各种污染物质，如化肥、农药、生活垃圾、农村家畜粪便等，通过降水或农田排灌时产生的地表径流、土壤渗透进入水体，造成的水污染。

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1.36亿亩；地膜使用量达63万吨，白色污染相当严重；我国畜禽养殖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在畜禽养殖业主产区，当地畜禽粪便及废弃物产生量往往超出当地农田安全承载量数倍乃至百倍以上，造成严重的土壤重金属和抗生素、激素等有机污染物的污染。

从1993年开始，张维理就开始了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显示，我国污染土壤已占耕地面积的1/5，污染最严重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耕地土壤生产性状最好、人口密集的城市周边地带和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应当更高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

“死胡同”

张维理不无担忧地说，目前我国化肥用量水平已经很高，受报酬递减率作用，靠增加化肥投入量能够引起的产量增长已近极限。1998年以来，尽管我国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质投入量一直在增加，但粮食单产却多年徘徊。这进一步说明，对于继续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仅靠增加农用化学品和能源投入量的模式将是一条死胡同，而提高耕地基础地力，藏粮于土，才是建立我国未来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必然选择。”

（摘自《瞭望》2010年第38期 记者孙英兰）

腐败新动向：非物质化贿赂透析

李永忠

非物质化贿赂多属于一种“温和腐败”，在交易上不那么露骨，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和温情面纱。

近期，关于“性贿赂”是否应该入罪的争论被广泛关注，表明腐败新动向给当前反腐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贿赂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过去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为隐蔽性较强的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贿赂。在一定程度上，非物质贿赂的腐蚀性，远非特定数额的财物所能企及，其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甚至超过了财物贿赂。

三种非物质贿赂类型：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

性贿赂是典型的非物质贿赂。指行贿人通过提供服务让受贿人获得非物质的利益，以达到利益交换或权职交换之目的。1994年，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看中了贵阳市北京路贵州饭店内美发厅人称“郑四妹”的一个女发型师。此女不仅已有家室，而且还是贵州某装饰公司的总经理陈林（另案处理）的情妇。陈林得知刘方仁看中了“郑四妹”，鼓励“郑四妹”要大胆地与刘方仁来往。四年后，刘方仁不仅将“郑四妹”调入贵阳市商业银行，而且在刘方仁的帮助下，陈林先后承揽了贵阳某酒店和某电信枢纽大楼等价值八千多万元的装修工程。

信息贿赂是指行贿人通过向有关人员提供信息而获取好处，受贿人可通过对所获得信息的利用，获得可观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提供人事职务升迁信息、商业秘密、审判机密等。今年4月22日，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检察机关针对黄光裕单位行贿的指控中，黄光裕除了直接送钱行贿外，作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还伙同他人将中关村上市公司拟重组的内幕信息故意

泄露给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相怀珠（另案处理）及其妻李善娟。

业绩贿赂是指发生在同系统上下级之间的一种贿赂方式。行贿人利用与上司的工作关系，故意将其业绩推到上司身上，有些上司为升官也向下级索取业绩，并封官许愿，在其得到提拔晋升后，主动或被动为下属办事。

非物质化贿赂成因何在：高压态势、法律漏洞、习惯势力

产生非物质化贿赂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高压态势使然。自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一直保持着对腐败的高压态势。近几年来，仅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干就有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吕德彬、郑筱萸、段义和等六人。一些高级别、大金额、重量级的物质化贿赂受到一定程度的重创，被迫进行转移。

二是法律漏洞使然。诸如性贿赂、感情贿赂、业绩贿赂等等，目前还是法律的空白点，因此容易成为索贿受贿者和行贿诱贿者钻空子的集中点。我国传统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已经无法涵盖现实中的贿赂犯罪形式，更无法适应当今反腐败形势。据了解，将贿赂规定为财物，源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贿赂扩大到“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订刑法未对贿赂范围作出相应调整，贿赂仍仅限于财物。

三是习惯势力使然。列宁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非物质化贿赂，特别是感情贿赂是中国几千年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变异状态下的一种延伸。“非物质贿赂”更易于点中官员的命门死穴。“非物质贿赂”很有人情味，寻租者往往通过感情联络、心理接近、思想沟通，使有权者警觉逐渐泯失、道德逐渐沦丧、信仰逐渐变异，以至突破纪律的规范和法律的底线，在潜移默化中一步

步演变为犯罪分子，因而就具有惊人的钻透力和成功率。流传甚广的“不怕官员有原则，就怕官员没爱好”，可以作为非物质贿赂对官员“杀伤力”的一个佐证。铲除这一土壤，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而我们目前对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在党内才初步形成共识。对上升到以制度为本，高度重视制度的载体地位，还需要假以时日。

与物质贿赂相比，非物质化贿赂有如下特点和危害。一是隐蔽性，非物质化贿赂与物质贿赂相比隐蔽性更强，不容易被发现，具有炮弹上的延迟引信的特点，穿透后的爆炸，破坏性更大。二是温和性，非物质化贿赂多属于一种“温和腐败”，在交易上不那么露骨，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和温情面纱。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三是多次性。物质贿赂表现多为一次性交易。每一次的权钱交易，双方大多心知肚明，彼此比较明码实价，权钱交易也大体相当。而非物质化贿赂则以感情为契机，以人性的弱点为突破口。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脱身！

铲除“非物质化贿赂”生长的土壤

有效防止和遏制非物质化贿赂的蔓延滋生，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简单。古人尚知，贿随权集。因此，封建社会治理贪污贿赂的长效处方无非二张：一是分权制衡，让监督权相对独立于执行权；二是重惩示警，加大贪污受贿者的腐败成本。

历史发展到今天，反腐败不仅成为全球共识，而且已成为全球行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腐败上的成功经验也具有了普适价值。

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一是公开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在全国的稳步推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二是舆论监督。“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语），不怕通报，就怕见报！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所倡导的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正在不少报刊及网络上有序展开。三是分权制衡。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和推行，巡视工作的不断深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加强监督的制衡力，为逐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邓小平语）勾勒出“路线图”。四是民主选举。随着票决制、公推直选、竞争性选拔干部等工作力度的加大，等级授职制式的委任制逐步缩小，权力中的民意成分不断加大，从而在权力的开端正本清源，促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规定，“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实际给予‘不正当（不应有）好处’，与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不应有）好处’相对应规定为犯罪”。比照《公约》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对我国现行《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客体进行调整完善，将受贿的内容被限定在“财物”范围内的法条予以修订，改为“财物和其他利益”。这种法条上的修订，加上党中央及中央纪委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文件，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变相接受各种形式的贿赂，既能有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也是避免非物质化贿赂泛滥的有效举措。

（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8月（下））

（上接第15页）农地，最大的问题在于改变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使他们从过去经营自己土地的小业主，变成了雇工身份。“这件事情对农民的心理、农村社会结构都会有深刻影响。我认为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恢复农业的本来面貌，让农民生产他们自己的产品。”他说。陈锡文认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是活的，要农民用全部心血去关注。

“二战之后，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主张搞以资本雇工为主的农业，虽然工商资本到农村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我们不主张把农民本来已经很少的土地拿

过去再来雇佣农民，否定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改变农村的经营方式。如果把精力放在加强农民社会化组织，农村永远会生机勃勃。”城镇化的本质不是农村土地的水泥化，而是人口的城镇化——在农村用地问题的解读上，陈锡文认为恰恰是“农地的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陈锡文说，一窝蜂大规模“消灭”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民赶进城市的作法，不是成功的城镇化，反而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摘自2010年8月24日《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季晓莉）

“小金库”为内部人员牟利已成集体腐败

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整治小金库的行动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8月25日,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公开透露,自2009年4月以来,通过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共发现“小金库”24877个,涉及金额122.42亿元。全国因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受到行政处罚842人,组织处理413人,党纪政纪处分1035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322人。

此前,8月中旬,为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印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小金库”问题举报受理方式的公告》,其中明确对于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查实的设立“小金库”金额的3%至5%,给予举报人奖励,奖励资金最高额为人民币10万元。

但是,在实践中,“小金库”外表形形色色,内在错综复杂,“小”已难涵盖其实质。业内人士认为,在某些方面,“小金库”已经成为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根源和温床,严重干扰了财经管理秩序。

解密私设“小金库”手法

采访中,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林立,特权集中,导致私设“小金库”手法繁多、形式隐秘,追查起来十分困难。

对于这样的说法,记者进一步采访了审计部门,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他的经验,私设“小金库”通常有4种手法:

首当其冲的便是在账户过渡时设立“小金库”。“在机构调整合并、前任与后任会计人员交接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单位利用机构合并,将部分账款隐匿、转移至‘小金库’,从中列支招待费、福利费。”这名负责人说。

而比较常见的则是往来款项核销后收回不入

账、收入不入账两种手法。

“有的单位在核销了对某单位的应收账款之后,又从欠款单位收回了一部分欠款,却未按规定进行账务处理,而是将收回的欠款以存单的形式形成‘小金库’。”这几种手法在审计人员看来,也是可以查处的,关键在于盘点库存现金时要谨慎查验。

最后一种则是利用虚假票据套取现金。

“有的单位将一些大额的虚假票据报销,套取现金,存入‘小金库’。”审计部门的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一般的虚假票据,比较容易发现。可对票据本身是真的,而内容是假的这一类票据,难度就比较大。检查时,需对某年某一类支出数额大的审计延伸几年,查找原因,询问相关人员或者通过举报线索才能发现。

屡禁不止根源何在

事实上,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小金库”的治理工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1989年、1995年和2009年开展了3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但很多人仍将整治“小金库”的行动比为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被判要将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每次他用尽全力,当大石快要到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滑脱,又得重新推回去,干着无止境的劳动。

“小金库治理也是一样,风声紧了,小金库活动可能会隐蔽、潜伏;治理劲头一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冲动和行为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业内人士说。

“‘小金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些单位通过搞创收,把一部分经营收入通过不列入规定账簿核算的方式留下来,变成集体的‘小金库’,给职工组织旅游外出、聚餐活动等,作为职工福利的来源。本来这笔钱是要上交财政的,却被扣留下来成了集体内部的活动经费。由于其本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努力积累的血汗钱,又有为集体成员谋利的性质,所以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那些能扣留‘小金库’的领导往往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员工所称赞和拥护。现在要取消‘小金库’，很容易遭到这个集体组织内部成员本能的反感甚至抵触，至少，他们不会很积极地去配合。”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记者。

尽管如此，有关部门仍在为治理“小金库”做着不懈的努力。

8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公开明确表示，将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实的“小金库”金额给予3%至5%的奖励，奖金最高额为10万元。

对此，林喆指出，举报“小金库”很难，除非是“某个内部成员在创收时被排斥在外，没有分到钱，或者他发现内部核心成员都分到了，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通过一番利弊权衡后，他可能会去举报。举报往往发生在‘分赃’不均的时候，所以受益者一般不会举报，谁也不想当恶人”。

“应该看到，一方面，‘小金库’的存在，在某种条件下为‘法人犯罪’如组织行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打击私设‘小金库’行为的问题上，存在着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利益很重要。”林喆说。

应先治法律“疲软”

正是在意识到“小金库”的“群众基础”后，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仅靠单纯的打击或运动式的专项整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制止“小金库”现象，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此前，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公开表示，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建设是“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根本任务，将贯穿于“小金库”治理工作的全过程，要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边治理、边规范、边完善，积极构建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铲除“小金库”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关于“小金库”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影响了“小金库”整治的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建设。

据了解，2009年，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但关于“小金库”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仍然规定得不明确。

一名律师向记者举例说，有的小金库资金是来源于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而设立的，这就

违反了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以及关于发票管理的规定；而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的“小金库”，则违反了会计法、预算法。因此，法律条文的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于“小金库”的惩治力度。

此外，从以往的案例来看，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被发现后一般被当做违纪来追究，但也有人认为，私设“小金库”明明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法律上究竟该如何定性也是一大难点。

“不能笼统地说私设‘小金库’是违法行为，因为目前我国法律上对此尚无明文规定。只能说它违背了政纪党纪，是群体组织的‘离轨’行为。因此，以违纪来追究私设‘小金库’行为并无不当。虽然从原则意义上讲私设‘小金库’还不能列入腐败之列，但它带有‘白色腐败’性质。”林喆说。

据介绍，所谓“白色腐败”，是指无论是社会普通成员，还是上层人士，都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如裙带关系。

“如果是四部门联手禁止‘小金库’，这就使‘小金库’行为变成了‘灰色腐败’，即指对之惩罚虽不受到其他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却为上层人士所拥护，如赌博现象。”林喆说，“可见，国家对‘小金库’的治理力度在加大。如果下一步在法律上再加以规定，那么私设‘小金库’就变成了‘黑色腐败’，即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如贪污受贿。”

此外，不少业内人士还指出，现有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之处也造成了整治“小金库”的法律“疲软”。

“比如一些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收费，到底违反何种法律法规无法界定，这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就很困难，只能进行教育，敦促其归还而已。因此，必须尽快堵住法律方面的漏洞，通过法律铁腕根除‘小金库’。”业内人士说。

林喆认为，从整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上来看，“第一步要在财政收入中加大给各个单位留存的比重，使后者有能自主使用的经费。扩大了资金的留存，地方或部门就会有积极性去申报真实的经营收入，不再藏着掖着瞒着。财政透明了，就便于大家监督，腐败就无处藏身。第二步是税务要跟上，让这部分多留存的收入纳税。一切都变成了‘明’的，大家就会主动申报纳税，国家税收也就增加了。通过这样两条途径，‘小金库’现象就会慢慢消亡。”

（摘自2010年9月1日《法制日报》记者杜晓）

百姓和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官”

王和平

人是社会的存在，有人的地方，就需要有管理——政府。国民需要政府，也需要在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官）。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公务员服务的唯一对象，就是国民的福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和国家公务员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存在的意义所在。为此，一个公务员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否活出了（他）她之所以成为公务员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称职，就取决于（她）他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官”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行修养

“有才无德不可用”。“德”是一个人的根本，它决定着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大凡有为人民服务品格的人，都需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放弃自我，不为私利服务

常常阻止或困扰着一个人，使其不能做出慷慨奉献的东西，就是自私。自私是为他人服务的最大敌人。“官”作为公务员，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公”心。“官”的存在代表着“公”或“大众”。如果“官”失去了“公”心，就等于“盐”失去了“咸”的味道一样，就失去了它之所以存在的意义。“私”心是不能让人做“公”事的。想要成为“公”家人，就必须放弃自私的心。私心使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对他人的服务。私心甚至可以使人打着服务他人的旗号，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私利。自私的人，心里只有自我，没有大众；他（她）所拥有的公务员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正好是为了他（她）谋取私利的优越条件和资本。他（她）会辱没公务员的尊严，失去人民公仆——“官”的威信。他（她）们分明是在拿着国民给予的公权力，去反过来伤害国民。历史事实证明，大凡好官、清官，都一定是能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的人，都是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的人。相反，那些不称职的“官”

都是自私自利、以“官”为资本而贪图享受、鱼肉人民的人。为此，大公无私，是当“官”的首要道德修养条件。人民没有责任、也大可不必把自己的福祉和命运托付给“心术不正”的“骗子”。

具有同情和怜悯之心

“公务员”来自于大众，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是他（她）自己的父母，所有的孩子也都应该是他（她）自己的孩子。“官员”是大众福祉的责任人，他（她）应该和大众同享福、共患难。为此，具有同情和怜悯之心，是“官员”必备的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素质要求。他（她）能从痛苦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痛苦、从患难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灾难、从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需要、从无助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无助。在“官员”的眼里，百姓就是自己的家人。他（她）就是百姓中的一员、百姓的儿女、百姓的父母官、百姓的代言人。他（她）的命运就是百姓的命运，他（她）的存在就是为了百姓的最大利益。没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他就不能把自己的心和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就不能和百姓同甘苦、共命运，就无法把百姓的福祉作为是自己服务的最高宗旨。

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诚信对公务员尤为重要。百姓给予了公务员很大的权力，甚至把自己的福祉完全托付给了公务员，公务员必须要尽职尽责地为百姓服务。以“服务”的名义而得到的权力要不折不扣地用在“被服务”人身上。如果不忠于或不实践为了得到这公权力所作出的承诺，对百姓而言就是“欺骗”，对公权力而言就是“践踏”。作为公务员，光有“无私”还不够，还应该“尽心尽职”。“不作为”也是对百姓利益的损害、也是没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也是不忠信的仆人。

具有正义感

公务员以“公”为特点。“公”就要一视同仁，就要正直、公平、公开。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于

全体的百姓，所以，这个权力必须要为团体中每一个人公平、公正地服务。要本着人人平等，把人人都视为是自己的父母、亲友、恩人一样去公平善待，克服私欲和偏情。正义感也包括对善恶的分辨，倡导美善正气，遏制歪风邪气。社会的正义也要求对于社会的边缘人士、弱势群体、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遭天灾人祸者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呵护。

当“官”应该具备的管理或领导技能

“有德无才，不能用”。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人民公仆，光有基本的人品和德行还不够。不是所有正直、忠信、无私、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的人都可以胜任公务员，好人不一定就是“有作为”的人。

作为公务员，在具备了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具备当“官”的管理或领导技能。这个“管理”重在“理”而非“管”。“管”的运作形式是“发号施令一服从一奖罚”。这样的工作模式具有被动性和强制性，不但不能培养和提升百姓的公民素质，而且容易改变公务员“服务”的本质。“理”就是疏通所有的关系，人事的管理，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疏导。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人际关系出现紧张或没有疏通的结果。为此，作为公务员，必须具有耐心而谦虚聆听他人意见的能力、分析判断的能力、明智作出利弊权衡的能力、慎重作出决定的能力、和上下级沟通的能力、与群众亲和交流的能力、应急能力和纵观全局的驾驭能力。总之，“官员”作为公家人，一定要时时处处站在“大众”的“公”利上来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要以大局为重。不但要做到有所为，也要做到有所不为。要接纳人世间的有限性和不完美性，努力做自己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也接纳能力和条件不允许做到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做官也需要从做人开始，从人格的成长过程做起。社会上出现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等不称职的官员，不但来自于管理制度的有待完善、社会的不良风气以及传统文化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官员的自身道德素质修养。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荣八耻”正中要害，是从根本上提高官员以及公民素质的关键。

（摘自2010年9月14日《中国社会报》）

只有真学才能 真懂真信真用

王国忠

中央要求我们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理论，其中，真学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只有真学，才有可能真懂、真信、真用，任何科学理论，只有学好才有可能用好。

首先要真学，这是前提。真学就是要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理论。学习是钻研和精通的前提，是信仰和运用的基础，是传播和践行的条件。没有认认真真的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领导干部既要能动脑研究问题，也要能动嘴解释问题，还要能动手解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群众提出的一些思想疑惑，领导干部解释不清；群众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领导干部解决不掉；群众的一些具体利益，领导干部维护不了。存在这些现象，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学习不够、学习不勤、学习不好，尤其是对科学理论的学习不深、不细、不透。如果对很多理论问题和实际情况，领导干部自己都没有深入地了解、认真地思考、切实地掌握，那么，既不可能在头脑中清醒明了地研究问题，也不可能在言词上令人信服地解释问题，更不可能在行动上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成为真学科学理论的先锋、勤学科学理论的楷模、善学科学理论的榜样，真正做到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理论。

真学，先要做到真读。认认真真读书是学习的

第一要义。认真读书学习要变成常态，形成风气。领导干部个人要爱好，要自觉，要主动，要有通过勤奋刻苦地自学，不断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动。同时，各级组织也要有相应的督促、考核、奖惩等切实可行的激励保障机制。

其次要真懂，这是关键。真懂就是要融会贯通地掌握科学理论。

真懂科学理论，至少应该做到三点：了解背景、把握体系、掌握精髓。

所谓了解背景，就是要了解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都会打上历史和环境的烙印。不了解历史背景，很难真正掌握理论本身。正因为如此，龚自珍曾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意思就是说，要学习、掌握大的道理，就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历史、切实掌握背景。不能很好地了解科学理论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背景，是很难真正掌握理论的。因此，学习和研究科学理论，先要认真了解这个科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所谓把握体系，就是要切实把握科学理论整个理论体系。只是一些零星的观点、想法和提法，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体系，就不能叫理论。要真正懂科学理论，就必须有效把握理论的体系，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意的就学习和运用，不合意的就不学习、不运用。

所谓掌握精髓，就是要有效掌握和切实领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也就是有自己的精髓。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精髓，也就等于没有掌握理论。学习、研究任何科学理论，都要做到“纲举目张”，学通其实质，领会其要点，掌握其精髓。

再次要真信，这是根本。真信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坚信科学理论。

共产党人讲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科学理论的信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对科学理论

的信仰。对待科学理论，学习而不坚信，就等于没有学习通；钻研而不坚信，就等于没有钻研透；懂得而不坚信，就等于不是真正懂。对科学理论不能做到真信，就很难做到真用。做到真信科学理论，是正确对待科学理论、在真学真懂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真用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说真信是根本。

现在，有些人对科学理论学习不努力、研究不深入、信仰不坚定，不少时候基本处于“只认人、不认理，只要钱、不要情，只讲利、不讲义”的状况。很多专家学者讲的“信仰危机”，就是说在信仰上存在很多危机，有的甚至只讲实际的利益、只要现实的实惠、只顾眼前的需求，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远大的目标追求，没有扎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强烈的创业热情。之所以会如此，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科学理论的勤奋学习、深入研究和坚定信仰。因此，领导干部坚定地信仰科学理论极端重要，在刻苦学习、认真钻研的基础上坚定地信仰科学理论，头脑就会很清醒，立场就会很坚定，目标就会很明确，行动就会很自觉。

最终要真用，这是目的。真用就是要结合实际运用科学理论。学习也好，研究也罢，目的都是为了运用。古代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而不行，非真知。”毛泽东也曾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和研究任何科学理论的目的，全都是为了运用。不想用、不能用、不会用，学习和研究本身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学到用时方恨少”的问题，也存在“学到做时不会用”的问题。有些人学习科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运用，而是为了装点门面，武装嘴巴，教育别人。作为领导干部，在认真学习和深入钻研科学理论之后，首先要用科学理论充实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素质、规范自己的言行、指导自己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教育群众、推动实践，切实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摘自2010年9月13日《云南日报》）

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汪玉凯

何谓“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当年也是由不发达国家转变而来的。

西方社会转型有哪些特征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国外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的《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等。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概括起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都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也不甘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租活动。但是西方学者还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以后，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家庭初步实现现代化后，情况会逐步好转：如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等。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实现家庭现代化。

中国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

从 2008 年后，中国的人均 GDP 就已经达到 3000 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有些问题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少有三个特殊的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的过程。所谓“双转”交织，就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即中国同时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的。而且这种“双转”来得快，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缺少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实际上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如社会道德底线一个一个被击穿等。再加上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没有使农民比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离，尽管

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

杨宜勇

► 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会加剧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严重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并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其次，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城镇间收入差距。区域间收入差距所反映的是区

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三，中国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中国社会在转型中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了。这是当初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

推进改革是化解社会转型之困的唯一出路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使我们在这一过程付出了比较高的代价。首先，使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这方面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四大差距被放大了。再次，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社会的质疑。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强势集团，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而弱势群体、

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广大中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第三，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比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收入较高是由行业技术特点所决定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垄断所造成的，是不合理的。

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初次分配差距扩大。

下岗的、打工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此外，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发展、成熟，网络民主、网络监督异军突起，而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常常受到公众的诟病，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面对社会转型期我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侥幸和退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化险为夷，到达另一个境界。

从目前我国改革实践看，首先是让民众树立起对改革的信心，重构改革的共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围绕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如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废除不合理的特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给民众更多的选拔官员的选择权等。同时，要尽快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行业、城乡差距等，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上述问题不管涉及的是经济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敢于触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正面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摘自2010年9月13日《北京日报》）

第一,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依靠政府所赋予的垄断权力获取垄断利润,而这些高额利润绝大部分留在企业支配。第二,劳动法令执行不力,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但很多劳动保护法令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执行。与资本相比,劳动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法律保护,本该由劳动者享有的收入就会被资本侵蚀。劳动收入所占比例过低,是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约机制缺失,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不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对生产的贡献在各类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就必然会造成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仍然需要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加以调节,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收入。政府主要通过向富人征税并向穷人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调节收入差距,主要调节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然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限制了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一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居民收入的办法,税务部门无法切实掌握居民实际收入状况,从而为逃税、避税提供了可能;二是存在课税方式不合理、免征额过低等问题。这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不足,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偏低,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不是高收入者,而是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二是城镇部分社会保障仅仅针对特定群体,比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这些社会保险制度之外。三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导致社会保障待遇存在较大差距。

► 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思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我国收入差距的大部分形成于初次分配领域。

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首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对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逐渐减少国家持股比例。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行业竞争,最终消除垄断利润。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其进行管理。其次,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扭转单个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形成劳资双方共创、共享企业财富的新模式。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首先,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其次,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再次,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力度,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为健全税收调节等收入再分配机制提供必要前提。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将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特别是民营企业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围,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自2010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家庭财富累积影响未来社会结构

王天夫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十年间的财富创造已为财富积累奠定了基础。以改革开放中受益的第一代人收入差距为基准的社会结构分化，已经开始转化为决定第二代人及此后更多代人命运的消费与财富分层的基础。

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收入上的差距无法在代际间传递，而累积的发展优势与财富可以一代代传递下去。

因此，在观察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与财富累积不仅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对理解与判断社会结构的长远变化更显重要。

财富差距远比收入差距重要

分析近年来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支出变化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各个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都有较快的稳步增长，四年间的逐年增长基本都在7%以上。第二，各个阶层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差异。总的来讲，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相比较而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的下降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

而从收入中刨除支出，就得到节余，这也是家庭财富积累的基础（用于储蓄或投资）。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节余。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

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居民消费差距已大于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的消费不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008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消费超过了收入分布处于下层的60%家庭的总和。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收入最高的20%家庭2005年的消费也已占到处于下层的60%家庭消费总和的近95%。如果把中国城乡人口放在一起，我国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这样的消费差异体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多样性与多等级。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和消费质量更优、数量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而贫困家庭则在消费其他等级的商品与服务；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可能完全没有重叠。

事实上，巨大的消费差异还体现了更多深层次、制度性的社会经济特征。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 $Gini=0.39$ ）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 $Gini=0.34$ ）。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前者通常要小于后者。其原因在于经济生活中有多种因素来缩小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消费差异（消费水平在生命周期上的平衡、储蓄与信贷消费、投资支出、转移支付收入、累进制的税收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城市旨在平衡各阶层消费能力的各种手段没有起到作用，而中等与低收入阶层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其消费水平相对于收入水平更低。相对于收入差距，各阶层间的消费差异更大也更明显。

资产增值：财富差距放大器

在当前变革时期的中国，财富的积累对未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作用显得格外突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此变革过程中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公有到家庭财富开始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因为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中国社会资产财富的快速（下转第40页）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周保松

大学教育有两个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丰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这两个问题均牵涉价值判断和价值实践，我称其为价值教育。可以说，培养学生成为有智能有德性、具批判力和承担的知识人，是大学教育的目标。

◆ 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价值问题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价值。人的独特之处，是能够作价值判断，并由价值指导行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会选择做对的事，过好的日子，坚持某些信念，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而要活得好，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评估，确保自己作出正确选择。

简单点说，因为人有价值意识，所以意义问题必须由价值来支撑；因为人有反思意识，价值的规范性必须得到理性主体的认同。所以，大学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和反思意识得到充分发展。关键之处，是容许学生自由探索，包括阅读人类文明的种种经典，讨论当代社会的政治及伦理议题，以至对一己心灵的不懈内省。没有这一过程，我们难以理解自我，也无从肯定生命的价值立于何处。

价值的实践，必须在社群当中进行，因为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活在种种制度和人际关系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彼此的权利义务和合作所得应该如何分配等，是公共生活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人也活在自然之中。但经过数百年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人类完全站在

自然的对立面，并导致巨大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 21 世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迫切议题。

由此可见，从人与自身，到人与社会，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牵涉价值教育。我们作为价值存有，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价值，而是如何发展人的价值意识，如何论证和肯定合理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实践有价值的生活。这些都是大学教育的任务。

◆ 价值教育边缘化四个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价值教育在今天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第一，大学日趋职业化。大学将自身定位为职业训练所，并以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为最高目标。

第二，在以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主导的现代大学，常常主张知识生产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并将所有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搁置。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价值命题都是主观和相对的，因人因社会因文化而异，不算真正的知识。大部分学科因此纷纷从价值领域撤退，声称只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作中性解释。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到大学，长期以来都将价值教育等同于思想教育，并要求所有学生接受同一种思考模式，严重伤害他们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但人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思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个体。无论多好的观念和理论，一旦强行灌输，就成了教条，难免窒碍自由心灵的自由发展。

最后，价值教育在今天举步维艰，更根本的原

因，是社会早已合理化自利主义，使得人们不自觉地相信个人利益极大化是做所有事情的最终理由。风气所及，自利贪婪不再被视为恶，反而被当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大事宣扬。如此一来，所谓幸福生活自然被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道德考量则被视为对个人利益的外在约束。“只要不被人发现，什么都可以做”遂被广泛接受，伦理规范则逐渐失去内在约束力。

重建价值教育：使命、良知与自由

价值教育的边缘化，结果是大学批判精神的丧失。所谓批判精神，是指学生有勇气有能力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各种价值问题作出反思论证，挑战既有的观念习俗制度，并在生活中实践经过合理证成的价值，从而完善生命和推动社会进步。代之而起的，是实利主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充斥大学校园。

今天很多大学生根本未曾经历过价值启蒙便已离开大学，并安分进入既有的社会建制。他们不曾有机会好好认识自己，不曾试过和同学激烈辩论道德宗教，更不曾在面对身边及社会种种不公时，想过要起来为权利为公义而争。

在理应是他们最自由最富理想的时期，大学没有提供机会，让这些优秀的年青人认真面对生命及生命背后承载的价值。这样的教育，实在难以培养出有见地有抱负有价值承担的公民。没有这样的公民，整个社会将停滞不前，甚至向下沉沦。

要改变这个处境，首要的是大学必须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肯定价值教育的价值。教育最基本的使命是育人。人是教育的中心。透过教育，来提升人，转化人，鼓励学生培养德性，并活得自由丰盛幸福。我们应先立其大者，并以此为大学目标。

下一步，是重新肯定教学为教师的首要工作。不知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之内隐隐然已有这样一种共识：要在大学生存，必须不花时间在学生身上，

因为学校评核重视的是研究和出版，不是教学。这种将老师从学生身边赶走的制度若不改变，价值教育将无从谈起。

道理再浅显不过。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理想的教学，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遇。要启迪学生，老师需要言传身教，倾注大量心力和学生对话交流，更要像园丁那样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

再下一步，即使我们重视价值教育，也要打破将它当作几门课程，又或专属某个教学部门的思维。要有效发展学生的价值意识和批判精神，大学要有整体的教育观，并将价值教育的理念渗透到大学每个环节，包括主修课程和通识教育、宿舍生活和学生社团活动等，让学生时刻能够思考价值，实践全人教育。

最后，大学必须创造一个活泼多元，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让师生在其中自由探索。价值教育不应是独断的、教条的、家长式的灌输，每个学生都应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同时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大学不应将学生倒模成千篇一律的人，而应鼓励他们发展潜能，活出个性。

价值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反思能力具道德意识且关心社会的自由人。有人或会问，既然推崇多元，岂不表示大学要在所有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并非如此。思想自由是大学不可动摇的基本价值，而在自由之外，一所大学还应有更多高远的理念，包括鼓励学生热爱真理、追求公义、平等待人、重视环保、关怀弱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

无疑，当大学希望学生具有这些德性时，它已宣示了某种道德取向。教育的目的，总是将人由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更好的状态。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价值，而在于这些价值是否合理。真正的自由教育，不代表大学放任不管，随学生喜欢怎样就怎样；也不代表大学要伪价值中立，不敢有自己的道德信念。它所期盼的，是创造自由的空间，容许自由的人在其中自由思考，学会分辨什么是好的和正当的价值，然后在生活中好好实践这些价值。

（摘自2010年8月26日《南方周末》）

缺乏科学精神是缺少科学大师重要原因

杨卫平

科学精神的匮乏是我们民族从事原始性创新的软肋。有必要重新认识科学精神和科学精神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

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还从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作为上述现象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中国极度缺乏世界级的自然科学大师。去年，钱学森老人逝世了。温家宝总理多次引用钱老生前的话，引发了社会热议“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温总理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

现代科学精神的匮乏乃是我们民族缺乏科学大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让我们从科学精神的起源、科学大师成长的个人经历以及大师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探讨原始性重大创新所需要的基本个人素质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特征。

科学精神起源于好奇、闲暇和自由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家的气质及行为规范等精神层面的反映。科学精神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热爱真理、理性与实证、怀疑与批判、自由主义和协作意识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

众所公认，以逻辑严谨、追求实证、还原自然过程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精神起源于古希腊。在这个伟大时代，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众多宗师大家。有最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有人文科学家苏格拉底，体系哲学家柏拉图，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东、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等等。

科学精神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固然是由于其继承和光大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希腊的奴隶制和城邦民主制为科学精神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篇就说：科学和哲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一是对自然界的惊异而产生的好奇心，二是有思考这些好奇心的闲暇时间，三是有不受束缚的思想自由。

希腊人天性乐观，热爱生活，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是他们欢乐生活的写照。他们崇尚理性、热爱真理，对知识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希腊的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的优裕生活，使得民族中的精英个体得以闲暇并思考世界的本源问题。希腊民主的城邦制有助于科学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由于各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同时，没有任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来束缚人们的头脑，即便是体现希腊宗教思想的希腊神话，其完备的诸神谱系也反映了希腊宗教思想的对象性和逻辑性；所有这些，使得整个希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从科学精神的起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真理的热爱、允许自由探求的物质条件和思想环境是科学精神萌芽的三大基本要素。

在伟大的希腊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希腊产生了许多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

非功利性是科学大师个人成长的必要条件

非功利性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基本属性之一，功利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所有要素造成直接伤害。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最后，对功利的追求必然从根本上不利于团队的合作。有学者认为：需求驱动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推

动力，从社会层面看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讲，对物质性功利的过分追求必然有碍于其原始性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应该看到的是：丰厚的物质基础可能是减少科学家物质性功利追求过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科学精神所要求的非功利性主旨，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科学研究不应该更多地成为科学家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更多地成为满足科学家好奇心的认知实践。自然基础科学工作者一旦背上沉重的谋生包袱，其对真理的热爱将有可能让位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由于长期的贫困，以及清朝末年所见识的坚船利炮的西方科技威力，使得国人对科学的功利有崇拜般的痴迷，而对孕育现代科学的科学精神始终不以为然。如清朝末年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中华民族面对科学的基本心态的写照。竺可桢在1935年的一次《利害与是非》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近30年来所提倡的科学救国，只看重西方科学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培养科学成果的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应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正阻碍中国科学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至上和实用思维。

对待科学的功利主义思想，除了文化传统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社会发展造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兼容并蓄的社会思想环境是科学昌盛、大师频现的另一重要基础

近代科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首先是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精神，认为人乃万物之本。人文主义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支柱。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路德新教所宣称的“因信称义”，表达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颠覆了教会的绝对统治权威。长期以来，被神恩、天启、权威所禁锢的人类思想开始得到解放。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明了科学精神产生的基础，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科学大师不断诞生的条件，并应

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科学史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周、汉两朝，也分别经历过西东两周、西东两汉的动乱过渡时期。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其289年的存续时期内，也发生了无数的内外战争、宫廷变乱、藩镇割据等等重大社会动荡。这些，都摧毁了原本微薄的社会物质基础。此外，中华民族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生存压力特别巨大。因此，必须着力推进政治改革，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物质基础，藏富于民，着力蓄养一大批富足生活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跨代长期存在，应该是滋养学术思想大师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史学家公认：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如同修筑长城永远不可能真正抵御外族入侵，大一统的封闭思想体系也不可能长期地富国强民。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弱化以院士制度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官僚体系，在法律的框架内，以更加相信群众的心态，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自然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仍然秉持“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中，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我爱真理、我更爱论文”的不良学术氛围，和“我爱真理、但我不能得罪学术权贵”的处世价值。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摘自2010年9月3日《科学时报》）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

陆学艺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及其结构性分析

当前中国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互为基础。一般而言，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在前，带动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调整了，也会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和持续变化。所以，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经济结构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以稍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滞后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还是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

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由若干个分结构组成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以就业结构为例：197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一产占70.5%，二产占17.3%，三产占12.2%；2008年变化为一产占39.6%，二产占27.2%，三产占33.2%。1978年我国的二、三产业

职工人数只有11835万人，2008年二、三产业有46826万人，30年共增加3499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6万人。非农产业的劳力从1997年开始，已经占50.1%，超过了50%的临界点，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又如城乡结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08年则为45.7%，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有17245万人，2008年达到60667万人，30年增加了4.34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447万人。再如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这样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是个农业社会的结构。直到1978年，农民仍占82.1%。真正发生这个大变局，转变为工业国家社会结构的是这30年。但因为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候，没有适时抓好社会体制的改革，没有适时抓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因而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比较，现在的社会结构是落后了。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

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

早在1978年，社会结构已经比经济结构落后了。仍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为例，根据外国学者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0%以上，但2008年中国的二、三产业就业职工只占总劳动力的60.4%，差了20个百分点。过去30年，非

农劳动力平均每年增加1.03个百分点，需要20年才能持平。以城市化为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该达到60%以上，但2008年中国城市化只有45.7%，差了14.3个百分点。以过去30年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91个百分点计算，需要15.7年才能达到。再以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级应该达到40%以上。2008年中国只有23%。如以近来每年中产阶级规模增加1个百分点计，要17年才能达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是产生当今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

二、中国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社会阶层关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贪污腐败等大案要案频发，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暴力犯罪增加，诈骗、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特别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使得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是分阶段推进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势变了，就要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我们的基本经验。新阶段的任务，是要在继续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抓好社会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社会事业建设

过去我们一般把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统一称为社会事业，其实，从实践看，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事业建设，也应该是社会事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把发展经济强调到了唯一的地步，致使科、教、文、卫、体等的建设相对滞后了，出现了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这也是社会矛盾增加的原因之一。要真正做到“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近年的实践看，应该再加“业有所就”，并放在第一，这是民生之本，就像农民要有田种一样，城镇居民如果没有就业，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各地正在推进解决零就业家庭的问题，是一项善举。

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

我国已经从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体制就要相应变化，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好新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进行。

在社会体制方面，就当前来说，应该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流动体制、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协调体制，等等。有学者提出要重建社会，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是有道理的。当下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与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相称，必须首先破除，不能再犹豫不决。

新社会新体制要有新的社会规范。中国的农业社会几千年，农业文明很发达、完整，现在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就应建设好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社会规范。例如应该建好保证新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进行的法律、法规，人人有遵法守规的习惯，要建设好适应新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体制

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个决定符合客观实际需要，各地区正在贯彻落实，效果是好的。从几年来的实践看，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要重视县域社会的管理。中国有2000多个县，县城所在地的镇，1980年代时，一般只有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多数是由城关镇管理，既管农民，也管居民。现在的县城都已发展起来了，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大马路、大商场、楼堂馆所都建立起来了，但基层组织、社区建设等还没

有跟上来，多数还是由城关镇统管，基本上还是农村式的管理，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社会治安状况也不佳。这些城镇总共有几千万、上亿人口，还处于没有相应有效的组织管理的局面，这种状况亟需改善。

二是在发达地区，因为有宽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把基层社区做大了，原来有的居委会是个自治组织，没有脱产干部。现在有不少城市的居委会（也叫社区），派去了十多人、几十人的脱产干部（多数是事业编制），使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社会建设反而把社会建小了，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调整社会结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一定要协调，相辅相成。现在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结构调整的步伐，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标志性指标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2008年，我国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员的23%，离现代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

三、关于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在当今中国，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关于进行社会建设，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重申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开展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研讨。

科学发展一定是包含社会发展在内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当前，出现了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局面。把经济社会看作一对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从经济方面转到社会方面，着力解决好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就非常必要。

据调查，在相当多的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社会

矛盾和问题反而越多，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不高，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的呼声很高。但是，从最近媒体透露的一些发达地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信息看，长三角、珠三角的几个县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他们还在提今后要实现GDP“三年翻番”、“四年翻番”、“五年翻番”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方面的目标和任务则比较空泛，这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推进社会建设要有组织保证。

60多年来，国家建设有一条基本经验，凡是中央决定的战略任务，都必须在组织上落实，要有组织、有干部去贯彻执行才能实现。如果只停留在会议、文件上，那往往就会落空。

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大建设，现在又成为亟待加强的领域，应该建立一个相应的机构，从组织上落实这个战略任务。2007年北京市建立了社工委和社会建设办公室，2009年上海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绩。从这两个市社工委的实践看，他们遇到了困难和问题，最关键的是社工委的功能定位问题。社工委是做对整个社会建设工作进行宏观统筹协调的工作，还是就社会建设的某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现在他们在做的是后者。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社会事业、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工作，都已经有了相应的机构和部门在做。现在要紧的是整合这些社会工作的资源，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把这件大事办好。所以，要像当年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组建国家计划委员会那样，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主要就是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现在这些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由发改委中的社会司承担，而社会司只是发改委35个司局中的一个，显然不能胜任社会建设这个重大任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讲了多年要改变“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状况，而至今没有改变的组织上的原因。把社会司的职能，连同现有的人员和资源从

发改委划出来，组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抓社会建设，发改委则主抓经济建设，这是做好社会建设工作，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织保证。建议选一个省或市或县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再逐步推行。

第三，社会建设要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首先是人才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应该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组建好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把社会工作各方面的人员组织起来，并在实践中锻炼提高、逐步扩大，发挥组织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千军万马搞社会建设的阵势。

其次是进行社会建设要有相当的财力、物力投入。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地区和部门削减必要的社会建设的开支，把绝大部分的财力都投到经济建设上，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社会建设的投入，情况已有好转。但因过去欠账太多，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协调的格局还未改变；而且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有钱还是习惯于往经济建设方面投。例如都说教育重要，但至今还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要占GDP 4%的目标。

第四，搞好社会建设，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总结新中国6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几乎包揽了经济事务，也包揽了社会事务，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形成了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后30年实行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经济事务管得少了，经济建设却取得巨大的成就。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要学习经济建设的经验，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形成社会建设的动力机制，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去做，政府进行宏观统筹和协调，社会建设也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国现行的这套社会体制，是在1950年代以后，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是

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如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

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社会体制包括社会事业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并不成功，有些则还没有破题，整个社会体制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本改变过来。所以现在的经济社会运行中，两种体制并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社会成本很高。实践证明，现行的社会体制不改革，社会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

第五，两点具体建议。

（一）建议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这是因为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排序，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应该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然后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其二，这个总体布局最早是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他那时的排序是：政治、经济、文化。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件提法改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直沿用到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变动顺序，有例在先。其三，现阶段，我们要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把社会建设这件大事办好。

（二）建议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就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步骤方法进行一研讨，作出相应的决定。目前正在制定第十二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应该把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到规划中去。

1993年以后，每年年底召开一次经济工作会议，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社会建设的任务突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所以每年在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就很有必要。当然，这两个会，也可以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摘自2010年8月30日《学习时报》）

推进和发展党内民主的若干思考

田喜荣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如何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是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基层党内民主的现状

推进党内民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不知”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特别是农民党员和流动党员，由于文化素质低，入党后又缺乏系统和经常的教育培训，根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自己的民主权利，不理解或不理解党员的主体地位。认为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也由于事务性工作多，经常性学习教育不够，对这些问题也知之甚少。

二是“不愿”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一些党员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不强，认为民主集中就是先民主后集中，最后集中权在领导那里，普通党员说得再多也没用；一些党员个人崇拜、组织崇拜意识比较强，认为领导的水平就是高，领导说得没错，组织决定就对；一些党员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党员再对也推翻不了组织的决定；一些基层组织中好人主义甚行，一些党员宗旨意识淡化，开会讨论做决策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反正现在是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犯不着与别人脸红脖子粗地争高论低影响和气。

三是“不会”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一些党员综合素质差，虽然本人也有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的愿望，但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些党员对党组织形成的个别决议有疑议，却不知道正常

的讨论、建议、批评和检举渠道；一些党员明知组织的处理不合理，但不会行使自己的申辩权、辩护权、申诉权和控告权。

四是“不敢”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差，讨论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和建议，做决定办事情独断专行，认为持有不同声音是对自己的冒犯、是对自己不尊重，会后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不少党员对组织或党员领导干部作出的一些错误决策明知不对，却少说为佳，或者知而不言、任其发展；或者言而不尽，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

五是“不能”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一些党内的制度、法规不很完善，党员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没有平台，制约着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和民主权利的行使。

二、党员发挥主体作用、提高行使民主权利能力方面存在的障碍和原因

当前，在党员发挥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障碍。

第一，观念性障碍。部分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高度集权，个人说了算，不允许出现甚至存在不同声音。个别地方民主不民主主要看领导点头不点头，领导让你民主你就可以民主，不让你民主你就没有民主。片面强调组织大于一切，一切行动听从组织安排。个别单位只有组织要求，没有党员权利等等。

第二，制度性障碍。一是党员行使权利的机制不完善，操作不规范，党员民主权利停留在原则规

定上，没有形成有效的保障机制，导致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党内的许多制度规定有明显缺陷，党内工作制度、议事制度、表决制度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过去制定的一些制度与现实要求脱节。三是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对普通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保护措施不够。

第三，素质性障碍。不少党员习惯领导说了算，一切由上级决定，对领导干部滥用手中权力侵害党员民主权利缺少举报和提出意见的勇气。相当一部分基层党员文化理论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强，缺乏党内民主修养，行使党员权利的能力不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素质低下、民主意识淡化，害怕民主、不想发扬民主，不给党员提供发扬民主的平台。

第四，环境性障碍。一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一贯奉行领导代表组织，领导说了算，党员用力干。一些党员提出不同意见，不仅得不到组织的接受和采纳，得不到党内同志的支持与理解，而且还会遭到其他党员的非议，认为是出风头，制造不和谐不团结，从而受到排斥、孤立甚至对立。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即使有民主的种子，也没有民主的土壤；即使能够勉强发芽，由于根系不发育，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三、推进和发展党内民主的途径和方法

推进和发展党内民主，必须紧紧抓住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这个根本，寻求实现的途径。

1. 坚持不懈加强党内民主教育。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纳入日常学习教育之中，做到制度化、经常化。要进一步提高民主集中制的质量。不论决策环境多么特殊，“集体领导”的观念不能淡化；不论决策内容多么繁多，“民主集中”的过程不能虚化；不论决策时的意见是否一致，“个别酝酿”的环节不能变味；不论决策中遇到的情况如何复杂，“会议决定”这一形式不能变通。要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有效管理和切实监督。要严

守党的组织纪律，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其他党员的特殊权利，更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2. 坚持不懈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必须从解决机制入手。要建立保障党员人权的机制。保障党员的生存权、学习权和发展权，建立党员定期培训制度和平等的党内晋升交流制度。要建立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机制。保障党员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党内听证制度、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纠错改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3. 坚持不懈培植良好的党内民主政治生态。首先，要净化党内民主空气。要通过开好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开展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格落实党内民主监督的有关制度规定，使广大党员在关心和监督党内事务中，养成良好的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形成党内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坚持平等议事，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其次，要营造党内民主环境。要建立党员定期党性分析制度，对那些表现突出，切实能起到模范先进作用的党员，大力表彰和宣传，增强其政治荣誉感；对那些理想信念不坚定、行为涣散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对那些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思进取的党员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营造党内民主环境必须与开展反腐倡廉结合起来，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第三，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民主是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之上的，党内民主也是如此，必须建立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之上。党的团结统一，根本的是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中央决策。同时，要牢固确立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自觉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行动，维护地方各级党委的权威，绝不能阳奉阴违。

（作者系中央党校第29期中青一班学员）

毛泽东如何研读国学经典

卢志丹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广大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毛泽东一生勤于读书，博识国学，造诣颇深。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发扬国学；提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以及军事等领域的智慧遗产；在活用典故章句、诗词创作和国学品评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从青年时代开始，亦为时代风气使然，他对国学的学习和运用总是与“救济”中国、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批判地继承的特色。毛泽东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他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著名诗人萧三哥哥，与毛泽东、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

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且主张：“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他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其中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全部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空闲，他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百丈

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他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毛泽东还通过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10期）

（上接第28页）增值。

通常来讲，财富积累的三个途径包括储蓄、遗产继承以及资产增值。截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家庭财产的积累。因此在当前的中国，储蓄（扣除消费支出的节余）成为资产财富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而资产增值则是财富差距最为重要的放大器。

中国家庭的财富积累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因素（包括个人逐渐进入市场参加经营、住房的商业化、各种社会福利保障逐渐市场化等等）促使这一趋势凸显。在早期，只有富裕家庭在积累财富，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积累开始加速。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投资增值也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提及房产、股票、基金等各种投资理财手段。数

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普通城市家庭的财富平均增长了4倍多。

财富的累积过程显示了一系列的差异现象。第一，财富累积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显而易见。有研究表明在1995—2002年之间，干部家庭平均累积了比普通家庭多30%—50%的财富。第二，财富累积的门槛效应以及资产增值的放大效应使得贫富差距飞速扩大。资产价格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阻隔了穷人的进入。随着资产的增值，富人所持有的资产价格进一步快速上升，累积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也更有能力购买更多的资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与放大的过程，必然加速拉大财富多寡之间的差距。

（摘自2010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霸 权 之 锚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巡视

李因才

五角大楼发布的《2009 年度美军基地结构报告》显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遍及六大洲(除南极洲外)、四大洋,辐射全球 38 个国家。基地总数 716 处,其中,陆军和空军基地较多,各有 293 处和 261 处,海军 136 处,海军陆战队只有 26 处。

值得注意的是,五角大楼每年发布一次的这类报告,并未将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比如,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开辟的数百个基地,以及在“新欧洲”国家修建的十数基地,都未被列入名录。加上一些通过政府间秘密协议获取的或其他不适宜公布的场地,五角大楼管控运作的军事基地不下千处。

这些密集分布的基地,和驻扎或部署其上的约 40 万美国大兵,以及巡弋在各海域的航母战斗群、舰艇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权力版图。正是凭借这一网络,美利坚可端坐权力金字塔尖,一方面迅速对其指控的任一“无赖”、“流氓”、“撒旦”国家或政权挥舞“道德”利剑,另一方面又能深入参与世界各地事务,将华盛顿权势辐射到全球各角落。

美国霸权成长图

战争是获取和拓展军事基地的最有效手段。1898 年年轻的美利坚初试牛刀,即从老大帝国西班牙身上获取 4 块战略要地: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关岛。美国军队直到 1992 年才退出菲律宾,而波多黎各和关岛则一步步沦为美国领地,成为五角大楼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扩展势力的重要据点。值得一提的是,古巴的关塔那摩名为租借地,却无租期。卡斯特罗革命后,华盛顿甚至赖着不支付租费。这块面积 45 平方英里的天然海湾,不仅是美大西洋

舰队的主要训练基地,还是美囚禁重犯的地方。大批“基地”和塔利班成员在阿富汗战争后被关押于此,并酿出虐囚丑闻。

1938 年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只有 14 个,远少于其他列强。7 年之后,五角大楼却成了全世界最大地主,基地数目膨胀到顶峰。1941 年,美国只用了几艘破旧驱逐舰,就换得英国在加勒比 6 处基地的长期租借权。同年,美国又获得荷兰在格陵兰和冰岛的基地。为阻止希特勒,西半球大量的军事设施甚至在老列强的帮助下构建起来。这时,华府重点在欧洲,亚太还没新建基地,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又彻底改变了那里的情势。

受基地所在国家的抵制和削减兵力影响,二战后美海外基地大幅压缩。仅 1947—1949 两年间,基地数目即从 1139 锐减至 582,撤减近半。不过,这种状况很快逆转,欧洲的冷战和亚洲的两场热战使数字再次急剧攀升。华盛顿不仅在东亚和西欧大肆构建同盟圈,获取战略要地,更在广大未决地区大肆扩张。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基地数目已达 815 处,1967 年越战扩大时,则持续增长到 1014 处。这一扩张态势终被痛苦不堪的越南战争击破,美国垂头丧气,再无力进取。中东和非洲的基地损失惨重,在革命和民族主义压力下,伊朗、沙特、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纷纷弃守。几十年间,美国还被迫从法国、南斯拉夫、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据点撤离。此后,基地数量一直维持在朝鲜战争时的水平。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势力重返中东,沙特成了美屯兵重地,借以威慑萨达姆政权。不过,数千

美国大兵在伊斯兰圣地耀武扬威，却种下了“文明冲突”的祸根。本·拉丹即将驻沙特美军视为伊斯兰的伤疤和对其文化的玷污，不断鼓动恐怖袭击，最终酿出“9·11”。

“9·11”之后，华府战略界在预防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崛起的同时，越来越关注所谓“不稳定弧形带”。这一地带由加勒比海沿岸、非洲、高加索、中亚、南亚和朝鲜半岛诸地区构成，能源蕴藏量丰富，但内部危机重重且不断向外扩散，被华府看作对自身利益的重大威胁。和中俄等崛起大国以及像伊朗这样的敌对性地区大国不同，“弧形带”构成的主要是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盗活动、毒品泛滥、难民流动之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付这类威胁，大型、永久基地显得代价高昂，又不合时宜，美军需要更加灵活机动、小型化的“靠前部署”。为此，小布什政府曾连番进行重大布局，包括在“弧形带”周边寻找新的基地，加强布防，以及调整驻军方式，缩短驻军期限，将小型基地“浮萍”化等。

例如，在之前从未掌握过的中亚地区，美军终于以支援阿富汗“反恐战争”为名，进驻中亚的几处据点，尽管美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处境尴尬。而在海湾地区，美军虽从沙特撤出，却在卡塔尔、巴林、阿曼站稳了脚跟，在科威特和阿联酋也有数处基地。其中，巴林驻有第五舰队，是美中央总部海军司令部所在，地位显赫。它与上述四国一起，共同控制着进出阿曼湾和波斯湾的要冲。即使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这里也能对伊朗形成钳制。

“平躺S形”的布局态势

若将五角大楼2009年公布的军事基地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不难发现美全球基地分布呈巨大的“平躺S形”。“平躺S形”东端从拉美摆出，经过本土的加厚加重，由北部的阿拉斯加基地群转向联结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由此一路南下，循东南亚至澳大利亚、新加坡，最后在印度洋美惟一据点迪戈加西亚处发生偏转，向北经中东、北非，逶迤延伸至

南欧、西欧、北欧。若单看欧亚大陆，这一布局则简化为“V”字形，一条由阿拉斯加而下，一条由北欧而下，会于“V”形底端迪戈加西亚。

在716处基地中，德国235处，日本123处，韩国87处。这三个国家加在一起，即超过总数一半。和基地分布类似，美军除阿富汗、伊拉克两处外，海外20余万军队也有大半驻在这三地。德国、日本驻军属二战后产物，而驻韩美军则属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军”主力，三地采用的都是长期部署，3年一轮换。由于过分集中，三地兵力和基地在2006年以来都属重点调整对象，五角大楼正大幅裁减。

美在欧洲军事基地布点最稠。以德国为中心，全欧布局呈现明显的冷战特色——西密东疏。单从基地数目来看，德国居首，意大利其次（83处），不过美在意驻军并不比排在第三的英国（47处）多——意、英两地远离冷战对峙线，故以空军为主，美在英约驻军1万，在意则不到5000人。排在后面的尚有葡萄牙（21处）、比利时（18处）、荷兰（9处）、希腊（7处）。除中立的奥地利、瑞士、爱尔兰，和将北约总部赶出境外的法国外，美军基地覆盖了所有冷战对峙线以西的国家。

美在德、韩驻军主要是陆军，美海外陆军2/3云集两地。部署在德的是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5万余人。冷战结束后，大批在德美军不仅维系着北约的存续，还对周边负有责任，曾参加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属重装部队，运动起来缓慢而笨重。2003年3月，第一装甲师费时3个月，才到达伊拉克战区。

驻韩的是第二步兵师，2万余人，分散在首尔以北的17个驻地，离南北军事分界线仅30英里。因被视为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基本无法从半岛抽身。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职时，一方面将部分军队调回国内，一方面着手将其驻地撤至平壤炮火难以覆盖的汉江以南地区，并强化其机动性，使之对半岛以外威胁也能做出反应。

在欧洲，以反恐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契机，华盛顿将军事触角逐渐伸向了冷战时的禁地东欧。在这里，五角大楼不仅很快获得了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波兰等国许诺的军事基地，还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这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眉来眼去。原属苏联内海的黑海，已转手受美控制。借此，美国已将势力推至俄罗斯眼皮底下。

从地域上看，美对拉美和非洲军事投入明显不足。两者都缺乏战略纵深，一旦有事，前者就需美动用本土力量护佑，后者则需从欧洲长途驰援。

两者相较，非洲尤其薄弱。在五角大楼的海外基地名录上，只能发现3个非洲国家。其中，埃及两处，肯尼亚两处，吉布提一处，3个沿海国家提供的也主要是海军基地。近些年，美试图透过“非洲之角”的反恐活动进一步向内陆渗透，并寻求在北非建立十多个“前沿作战基地”，但进展有限。非洲人对美国的“长靴踏上陆地”，不能容忍。2008年非洲司令部成立后，除了战乱频仍的利比里亚，竟无国家愿意提供办公地点，该司令部至今还被冷落在德国的斯图加特。

拉美地区以加勒比基地为主，由美本土延伸至巴哈马、关塔那摩，经美领地波多黎各抵达提瓜，再折返到东太平洋沿岸三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基地分布稀稀拉拉，在哥伦比亚新获6处算最大成就，不过哥却为此遭委内瑞拉等邻国白眼无数。自1999年万余军队撤出巴拿马后，美在自家后院的基地部署近乎一蹶不振。

东亚防线密集而厚重

东亚地区是大国与小岛国的势力交汇处，潜在矛盾多，又存在两大冷战断裂线（三八线和台湾海峡），故而是美军基地部署的重中之重。

在东亚的军力部署中，日本的地位特别突出。不仅因为第七舰队坐镇横须贺，部署有西太平洋唯一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更在于驻日美军特别强调机动性，防守范围也要宽泛得多，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驻韩美军的不足。这点从其基地和军种组成上可以明显看出：在88个较大基地中，海军占了35个，空军占了20个，各有军人6000和1.4万；另一方面，美国很少在海外部署的海军陆战队，在日本却有2万人。

驻日美军一半以上，分布在面积只有日本国土0.6%的冲绳县。陆战队主力驻扎于巴特勒兵营，而美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嘉手纳则位于冲绳岛西南部。华盛顿之所以看重这里，是因为冲绳这个狭长群岛，扼守着从日本到东南亚这条远东“第一岛链”的中段。在美军被赶出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后，冲绳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美军愿意主动放弃日本本土基地，却在普天间这个武装直升机机场搬迁问题上死磨硬缠，成了令东京头痛不已的“钉子户”。

在东南亚除缅甸以外的国家，华盛顿却备受隆遇。出于大国平衡的需要，东盟诸国虽不愿让出地盘让美军长驻，却也十分乐意抬着这位大款。在此地，美国的最大成果是获得了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驻泊权。从此，驻防亚太的第七舰队和驻防中东的第五舰队就可以相互照应，无需担心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供应不上了。

从目前态势看，美远东“第一岛链”自冲绳以下还缺乏连贯，而且由于基地不多，显得有些虚弱。为弥补这一劣势，五角大楼正积极强化美最西领地关岛的前沿威慑能力，并筹划将部分驻日韩军队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用第二岛链和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力量配合补充第一岛链的防御能力。如此调整，东亚防线显得密集而厚重。

美利坚是海洋大国，由“V”形基地分布图来看，其对欧亚大陆保持强势的策略基础，即在于以海权压制陆权。凭依自己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控制世界主要海域、要道，在实现外围包抄后，再施以“离岸平衡”，最终从三面向内陆腹地施压渗透，钳制区域大国。

在这条“S”形布局图里，中俄两个崛起大国都成了重点防御对象。不过和有着辽阔迂回空间的俄罗斯相比，中国从中感受到的压力要大得多。美军强化在“第一岛链”南端及关岛的防御能力后，中国几乎被封堵在近海范围。这对亟需保护自己能源通道安全和日益增多的海外利益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巨大挑战。

（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6期）

日本海洋扩张的伸与缩

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被日本巡逻船撞击的事件，再次勾起人们对日本海洋上一个多世纪表现的回忆。作为海洋意识觉醒最早的东亚国家，日本对岛屿和海权之争一向敏感。在二战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在海洋上伸出的手脚曾经扩张到北至库页岛，东至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等大半个太平洋地区。但二战后，这些通过武力抢占的地方大多失去。近年来，日本与三个邻邦——中国、韩国、俄罗斯，都发生过岛屿和海权争端。现在西太平洋上众多岛屿的归属和争议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现的。当年中美英在《开罗宣言》中强调，“日本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日本一些人想通过种种办法改变历史，注定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提国土不忘强调领海

日本陆地面积约为 37.8 万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此外还有大约 6800 多个小岛。不过，这些小岛占其陆地总面积不到 1%，而且还有许多岛屿都与周边国家有主权纠纷。事实上，与一些大陆国家民众提到国土面积时潜意识只指陆地面积不同，日本学者在提到 37.8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后，总不忘强调日本还有 31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海面积。有一些学者甚至把专属经济区面积故意和领海混为一谈。日本学者山田吉彦在《日本的国境》一书中称，“日本拥有主权疆域东起南鸟岛，西至与那国岛，北起择捉岛，南至冲之鸟岛（实际上是礁），总面积约 447 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六位”。

对于海洋面积和本岛外岛屿的欲望，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在《中国将要吞并日本》一书中说得更加直白：“日本应该树立大海洋观，牢牢掌握对日本周边岛屿的拥有权。拥有了岛屿，就拥有了广阔的海洋；拥有了海洋，就拥有了海洋中巨大的资源宝藏和岛屿本身的战略价值；拥有了资源宝藏和战略价值，也就拥有了日本国家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为了争夺对周边海域和岛屿的控制，日本想尽各种办法。2008 年，日本政府决定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获得沿岸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外

约 74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从而享有优先开发该区域海底资源的权利。这个面积差不多是日本陆地面积的 2 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这次申请实际上是把冲之鸟礁作为日本领土的最南端，并以此为基点要求新的大陆架海域。但这一提法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

为了对一些有争议的海域和岛屿取得“实际控制”，不久前，日本还公开宣称要在 2011 年 3 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 25 个离岛登记为“国家财产”，日本还表示将在众多离岛上派驻军队。对于这些行动，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写的《迈向海洋开发利用新世纪》一书透露出一些动机。该书称，把一些有主权争议和地理位置重要的岛屿作为“对扩大与俄罗斯、朝鲜、韩国、中国等邻国海洋经济区间的边界线，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该书还提出，如果日本不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海洋经济区只限于四个主岛海岸 200 海里水域内，日本将减少 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区，仅拥有 250 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日本势力曾伸展大半太平洋

实际上，向海洋扩张是日本近代以来两大战略思潮中重要的一股。从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起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曾让日本在海洋上的势力伸展到了太平洋深处。不过，1945 年 8 月 15 日这一天，历史又给日本的这些行动做了一个“定格”。

在北太平洋，日本和沙俄曾长期争夺位于日本北部连接堪察加半岛与北海道岛的千岛群岛。1855 年，俄日决定千岛群岛南部归日本，北部属沙俄，库页岛暂作悬案。1875 年，两国签订条约，将日占库页岛南部与俄占千岛群岛北部相交换。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回换给俄罗斯的库页岛南部，并夺得沙俄在远东的大部分权益。

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向中国方向扩张。19 世纪末，日本吞并了独立的琉球王国，并设立冲绳县。1895 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窃取明朝时就已经归属中国的钓鱼诸岛。借助《马关条约》，日本更进一步将占

据的琉球、钓鱼岛链延伸到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可随时切断中国南北口岸之间的海上通道。

在太平洋方向，尽管当时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已经被美德英等列强瓜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看到德国等同盟国败相已露，开始对德宣战，出动海军对德属太平洋群岛发动攻击，很快占据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太平洋岛屿。一战后，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形式，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占领。太平洋岛屿的获得和《五国海军条约》中禁止英美在距离日本本土 5000 英里的范围内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使日本本土的防御线扩大到中太平洋岛屿一线。由于日本在海洋上的战略纵深，它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巨大的优势。

但日本并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二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一度占据南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诸岛，北至阿留申群岛、东到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威克岛等一线的太平洋广大岛屿群。随着战争推移，这些岛屿先后被美国占领。日本投降后，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随之改为美国托管地，台湾、澎湖列岛也归还中国，但钓鱼诸岛却被美国托管。

美军占领日本后，曾于 1946 年 1 月发布《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67 号》文件，第三项明确规定日本版图所包括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 30° 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 1000 个邻近小岛”，其中并不包括钓鱼岛。1971 年，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将作为自己“靶场”的钓鱼岛管辖权“归还”给日本，但又表示，“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尽管日本媒体多次宣称“美国暗示或间接承认钓鱼岛主权归日本”，但美国公开的说法至今仍是“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在北太平洋，1945 年《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被交予苏联，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群岛在战后便划归了苏联，形成后来的日俄领土争端。

“时效”、“实力”与“时代”

实际上，对日本来说，与邻国之间存在争议的岛屿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面积最大的要数北方四岛了。北方四岛主要是指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

间的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四个岛屿。北方四岛在地理上属于千岛群岛，因此，俄罗斯也称其为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中，择捉岛最大，面积约 3200 平方公里；其次是国后岛，面积约 1500 平方公里；色丹岛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齿舞群岛面积也约有 100 平方公里。比日本与中韩等国有争端的岛屿都大得多。

对于北方四岛，尽管日本也连年强调自己的主权，但行动上一直比较低调。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在 1994 年至 2005 年期间，共有 30 艘日本船只和 210 名船员在进入有争议的水域时被俄方扣留。2006 年 8 月，一艘日本渔船在北方四岛附近海域捕鱼时甚至遭到俄巡逻艇枪击，有一名船员死亡。虽然日本外交部门发了照会和抗议，但日本对这一事件显得无可奈何，多数媒体不约而同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渔民的艰辛和家庭的不幸上。日本渔业厅官员甚至承认，日本船只在上述水域捕捞属于“非法行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在听取了秘书的电话汇报后，甚至继续在官邸享受最后的首相假期。

日本与韩国之间就独岛（日本称竹岛）也存在争议。韩国宣称 15 世纪就已对独岛实施主权。1905 年，日本宣布对“无主荒地”独岛行使主权。该岛现由韩国控制。尽管近些年来日本以独岛“17 世纪就属于日本”为由拒绝放弃主权，但韩国的反应常比日本强烈得多。

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对记者表示，海洋权益冲突涉及很多因素和利益，而且涉及海洋的国际法本身就有很多不完善和模糊的地方，这些决定解决海权之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位中国专家称，无论从历史上说，还是二战中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毫无疑问地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说，西太平洋上众多岛屿的现状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现的。亚洲多国在许多岛屿上的争端不仅有历史上殖民主义的原因，还有冷战时期两霸争夺以及冷战后各国实力消长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海洋和岛屿争议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这位专家认为，日本近年不断在钓鱼岛生事，原因之一是日本企图以所谓“时效取得”概念为主权占有奠定基础。但所谓“时效取得”迄今未被国际接受。这种“时效取得”实质上是一种“实力取得”，但当年日本用“实力取得”的大部分地盘都已经失去。

（摘自 2010 年 9 月 9 日《环球时报》记者于青等）

美国的人口登记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高剑清 姚彩霞

美国较系统的人口登记制度称为“出生死亡登记大纲”。由于几乎所有的婴儿都是在医院出生的，所以婴儿父母和接生医院都有义务进行婴儿出生登记，登记项目相当详尽，其中核心内容涉及父母与子女的社会关系等，以便为日后涉及儿童的监护、抚养以及继承权等民事纠纷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出生登记的材料都会被有关部门存入电脑系统，成为证明个人身份的最准确和最具法律效力的原始材料，随时可以在各地查找和调用。此外，还有系统的婚姻、迁移、死亡、就业与失业登记制度。

没有明确的户口制度

美国法律认为“户口登记”侵犯人权，因此没有明确的户口制度，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美国公民在国内是可以自由迁徙，随意搬家的。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任何户籍手续就会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相关权利，包括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并自动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是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美国公民平时进行迁徙和工作，迁移登记是以个人纳税地点为依据的，充分体现了权利与贡献的对等原则，把实现公民的发展与纳税人资格联系起来，即一个人及其子女能否获得在当地的发展权，不在于他有没有当地户籍，而在于他有没有向当地政府纳税。

尽管如此，当美国公民迁移和移居某地，其生活状态必须符合该城市卫生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有一定的住房面积，有稳定的收入能呆在该地。另外，影响老人和子女抚养的迁移，是要受到限制的，领政府救济的人，也不得随便迁移。所以，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迁徙在现代社会不被允许。否则，有关部

门将出面予以法律制裁，用这种方法维护一个城市的和谐和发展。

通过社会保障号掌控人口状况

在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身份证，因此，护照、驾照、信用卡等证件常常扮演身份证的角色，但它们的取得都必须以拥有一个社会保障号为前提。社会保障号(SSN)是美国政府进行人口管理的法宝和基石，是美国公民享受医疗保险、失业救助、领取工资、住房补贴、缴纳保险、看病就医等所有获得社会保障的凭证。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给自己的资料能寄到，享受的权益能不漏掉。

美国的各级政府还可以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美国人离不开驾照，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人将驾照放在钱包里，既可以在被警察检查时表示自己的合法驾车身份，也可以在某些场合证明自己的身份。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在用信用卡购物时，商店通常会让顾客出示一张带照片的证件，来证明信用卡不是盗用别人的，这个时候一般会使用驾照。如果确实没有驾照，可以向驾照发放部门申请一张不能用来开车的证件，上面印有照片，同样可以在某些场合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除了驾照之外，信用卡也常常可以起到证明身份的作用。经常乘坐飞机的美国商务人士通常会在网上

订机票，到机场直接取票登机，他们只要把信用卡插入各航空公司的自动售票机，机器就会自动打印出其在网上购买的机票。由于信用卡存储了确切详实的个人基本信息，出票机可以以此判断这是不是与网上购票人的个人信息一致。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银行在发放信用卡时，会把持卡人的照片印在卡上，这不仅不仅可以防止信用卡丢失后被盗用，还使得信用卡可以更好地发挥替代身份证的作用。

“看不见的手”调控

人们也许要问，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没有户籍制度、自由随意迁徙，并没有造成美国社会秩序混乱，因为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市场调节往往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社会经济秩序有条不紊地运行。

比如，社会安全号在防止商业欺诈、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商界很少有人敢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搞欺诈活动，这并不仅仅因为美国人觉悟多高、品德多好，更关键的是制度的作用。好的制度使得坏人不能干坏事，而坏的制度会使得好人也逐渐变成坏人。社会安全号制度使得任何人如果留下污点，今后将得不到别人信任，也找不到生意伙伴。驾照和信用卡尽管拥有验证证身的功能，但要想申请到它们必须先从社会安全局申请到一个社会安全号。

总之，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和缴税缴费情况等实际上都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社会保障号等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口流动情况被随时清楚地掌握着。

移民法规的今昔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这种以出生地确定国籍被称为“属地”原则，即凡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从而享有相应的福利。加拿大、巴西等30个国家都采取这一原则。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是在内战期间通过的，当时的考虑之一是以宪法的名义使奴隶拥有合法公民的身份。

“属地”原则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开放理念的体现，但同时，在美国生育成为非法移民留在美国的“法宝”。根据相关规定，遭到驱逐的非法移民可以用“离

开给子女造成痛苦”的借口，向美国法庭提出留下来的申诉。此外，当这些非法移民的孩子长到21岁时，可以凭借美国公民的身份为父母申请“绿卡”。同时，该原则也引发了到美国生孩子的热潮。为了防止非法移民利用这一规定，美国一些议员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修改相关条款，使非法移民在美国生的孩子无法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美国众议院目前正讨论修改相关条款。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国籍上采用“属血”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人根据其祖上的血统获得国籍。而如果议案最终在两院通过，美国也将步入“属血”原则的行列。由于此前亚利桑那州通过的“史上最严苛移民法案”在美国引发了激烈争议，任何改变宪法第14修正案的行为都可能演变成另外一场移民政策之争。分析人士认为，议案如果想在两院通过，困难重重。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某些缺陷，一部分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一部分源于传统社会制度安排。通过与国际社会比较，我们必须正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同时考虑到本国国情，以设计出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

一是去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要使户籍制度真正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偏离，使户籍制度和社会待遇脱钩，逐步削弱其对流动的限制和作为执行分配依据的功能，加强其作为人口信息和民事关系真名服务的功能，实现平等的经济机制。

二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速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人口、资本、市场的集聚，实现共赢，实现劳动力、人才流动的自由模式，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创建安定社会大环境，以城市为中心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注重农村教育文化普及及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健全就业信息网，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三是加快立法进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尽快修订户口登记条例并出台《户籍法》，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律基础。有关部门要尽快启动起草户籍法的相关工作，将近年来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和各地探索的成功经验尽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户籍制度法制化、规范化。

（摘自2010年9月8日《中国信息报》）

80年前的台湾雾社起义

陈军

台湾少数民族最早发动的武装抗日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抗日斗争史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抗日斗争的历史必定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台湾少数民族发起的雾社起义。

雾社（“社”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位处台湾岛中央位置的埔里山区（现属台湾南投县），海拔1200多米，居中部山区出入的门户，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距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此地山明水秀、气候温和、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处在地势险要的枢纽地位。雾社地名的由来，是因此地常有山风雾气缭绕，故得名。千百年来，在雾社附近及其周围的山区，繁衍了台湾少数民族中的泰雅人、塞德克人等族群。雾社群的族人分属马赫坡社等十几个部落，其中参加雾社起义的有马赫坡社、塔洛湾社、波亚伦社、斯克社、荷歌社、罗多夫社等六个部落，约有507户、2100多人。他们因血缘而形成部落共同联盟关系，有共同崇敬的祖灵信仰、共同服膺的祖先训示，遇有岁时祭仪，则共同举行祭祀，当有外敌侵扰或战争发生时，雾社群的族人更一同投入战役，抵御外强。

1895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后，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给台湾的同胞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殖民统治更为残暴。为了确立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权力，先以武力进剿山区的少数民族领域，沿袭清廷实行“理蕃”政策，在部落外

围设置“隘勇线”，不准其自由进出，禁止与汉人往来，禁止持有枪械弹药，强化警察统治，树立殖民者的绝对权威，为了增加新占领的地域及保护伐樟熬脑事业，以武力逼迫少数民族缴械“归顺”。他们将大肆开发土地，掠取资源作为殖民政府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少数民族同胞进入森林砍伐巨木，兴修神社。雾社的少数民族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木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十分惊恐，担心遭到神的惩罚。日本警员为使树木完好，强迫伐木人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使少数民族同胞无法忍受。日本殖民者还强迫台湾少数民族儿童实行同化教育，强制推行日本的大和民族文化，有意引发文化冲突，致使文化冲突中的社会瓦解日趋严重。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行改变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作物由小米转为水稻，狩猎也受到严重的限制，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虽然看起来台湾的少数民族是随着日本人的意志而转变，不过实际上抗日的意志则更加坚强。

每年的10月28日，日本殖民地政府为了纪念治台初期被抗日义军击毙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都要在台湾各地举行“台湾神社祭”。雾社地区亦奉命于前一天举行联合运动会来纪念，雾社的日本人都忙于此项活动。1930年10月27日，日本人的凌虐剥削激起了台湾少数民族中的泰雅人抗日的决心，雾社六个部落的少数民族同胞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压，族人们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信念，在台湾少数民族领袖、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带领下，发动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雾社起义。莫那·鲁道率领六个群组部落的族人首

先攻陷了日本人的13个驻扎所及雾社联合运动会会场，当天就杀死了130多名日本人。雾社抗日起义爆发后，震惊了全台湾及日本，殖民当局立即下令抽调台湾各地之军警部队集结埔里，出动数千人的军队发动了“军警协同总攻击”，对只持有竹枪、大刀和少量缴获步枪的雾社起义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日军动用了山跑部队、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对义军栖身的马赫坡溪谷展开了大规模的炮击、轰炸和围剿，面对英勇彪悍、擅长丛林战的起义民众，恼羞成怒的日本殖民者竟然违背国际公约，从日本国内运来毒气弹，动用飞机对雾社山区投掷，山林谷地毒气熏天，到处尸首累累，以致事隔半年之久，人们仍不能进山。

在一个多月的血战中，义军共杀敌数千余人。到了12月初，抗日战役已经持续四十余天，壮志未酬的勇士们，陷入了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困境，虽然日军军警部队的空中轰炸与地面炮击逐渐减弱，但地面部队和日军组织的“蕃人袭击队”已经逐步向义军所在地逼近，形势相当严峻。义军战士和民众抱定战死的决心，拒绝了敌人的多次劝降和诱降，不少台湾少数民族妇女，为激励丈夫和儿子勇往直前，不惜自缢身亡。义军领袖莫那·鲁道在受伤的妻子吊身亡后，无奈亲手枪杀了两个年幼而可爱的孙子，将三位亲人的尸体放入耕作小屋，一同放火燃烧，然后带着满腔的悲愤，独自进入大山深处，在大断崖持枪自杀。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则率领最后一批抗日志士，在马赫坡岩窟继续顽强抵抗。日军无奈，便胁迫其妹妹马红·莫那携酒劝降，但志节坚定的塔达欧·莫那不为所诱，依照族人的祖训习惯，与妹诀别，举行“最后酒宴”，高唱祖灵歌，向生他养他的山林告别，兄妹拥别后，即与其它四名勇士，奔向马赫坡内山自缢，壮烈成仁。当时雾社的少数民族同胞人口不过2100人，其中就有900余人在起义中战死或自杀，占雾社总人口的43%。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和不屈的精神写下了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上最英勇、最悲壮的一页。

台湾少数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雾社起义得到了祖国人民的支持，《上海报》、《华北时报》都刊登了相关的起义报道，对浴血奋战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关怀，给予了有力的声援。

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是台湾少数民族历史上一一起壮烈的抗日事件。雾社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台湾、也震惊了日本，它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理蕃”、“日化”政策的破产，标志着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民族意识的觉醒。雾社起义也向世人宣告，尽管台湾已经沦陷了35年，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雾社的台湾少数民族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整整80年过去了，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壮举，至今仍被后人传颂。如今，烈士们的英灵已化作了不朽的山魂，萦绕在雾社这片浸透着血与泪的土地上。如今，昔日的雾社已重建为南投县“大同村”，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为纪念雾社起义者的英雄业绩，1953年，台湾民众在雾社樱台修建起一座高大的名为“褒义坊”的纪念碑，横额题字“碧血英风”，纪念碑两侧的坊柱上端刻着这样的对联：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义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1995年，正逢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台湾光复五十周年纪念，抗日烈士莫那·鲁道的铜像也矗立在“雾社抗日事件纪念碑”园区内，这位台湾少数民族优秀的儿子和那些与他一同浴血抗日的数百位雾社起义英烈的尸骨和英魂一起长眠在这里。

（摘自2010年9月16日《团结报》）

“中国”：位于中间的国家

在中国的周围至少有三个大国，分别在中国的北方、东方和西南方。大陆强国俄国正在复苏之中；海洋强国日本正在成为正常国家之中；介于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印度正在崛起之中。如果能解决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领土纠纷，印度有可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否则就会在海洋和陆地之间摇摆不定。在这三个国家之外，美国正在中国四周巩固军事同盟，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周围还有一些力量在第二等级的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韩国是一个；越南有很好的潜力。这两个国家都是半岛国家。在海上则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它们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并和越南、菲律宾一起，在地理上包围了南海，使南海成为一个有许多领海争议的地区。

所以，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中国已经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当我们“放眼世界”时，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国”——夹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欧洲较远，而美国的海疆一直向西推进到第一岛链，兵临中国城下。

如果把地图竖起来，东边向上，就会发现，朝鲜和越南是中国在大陆上的左右两翼，台湾岛是中国的先锋，日本群岛（包括冲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是中国在海洋上的左右两翼。当然，这是从地理的角度看。从政治的角度，无论是陆地两翼还是海洋两翼，都不在中国的阵营中。台湾在法理上属于中国，现任“总统”马英九被许多人当作统派，但两岸关系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在左翼的韩国和日本的领土上，美国驻扎了数万军队。美国可以用冲绳的海空军封锁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航道。

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和越南分别处在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北、南两端，是自然地理的延伸。在

古代，这两片土地属于儒家文化圈，向中国进贡。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有相当大的土地属于中国。两国也和中国发生过许多场战争，因为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它们的战争记忆比中国人清楚得多。在近代，它们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跳板。这两个地方是中国的软肋。虽然它们彼此相距较远，却有许多相似之处：(1) 它们的外海就是第一岛链开始的地方，从陆地到海洋共同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地理包围；(2) 人口密集，朝鲜半岛和越南各自有大约 8000 万人，与德国大致相当；(3) 虽是大陆国家，却有漫长的海岸线，地理位置优越，但也容易遭受海上入侵；(4) 在历史上都曾是中国的附庸，接受了儒家文化并使用汉字，后来才发明本国的拼音文字；(5) 与中国发生过多次大的战争，互有胜负；(6) 在近代史上被海外入侵者征服，成为殖民地，中国的军队和影响被驱逐出来，殖民者接着从那里出发入侵中国；(7) 20 世纪中后期，在中国的直接支援下，朝鲜和越南都和美国军队进行过殊死的对抗；(8) 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越南曾经是苏联的军事盟国，而中国是这两个军事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9) 朝鲜、越南以及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两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都曾流亡中国；(10) 都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半岛南部的韩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越南近年来发展迅速；(11) 它们的南北之间或者是分裂的，或者是曾经分裂而裂痕尚未愈合。

中国有复杂的陆地边界，海上的情况也同样复杂：东边被岛链所拦截；向西要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后就会发现印度的存在；美国军队则无处不在。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牵制，就像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海上对德

国的牵制。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而日本的大部分石油运输沿着这条海岸线北上，并穿过台湾海峡，因此受到中国的制约。反观德国，它的船舰要经过北海，穿越英吉利海峡，因此容易受到英国的控制。日本不能在海上形成对中国的完全优势，两国的地理位置互有优势。天空已经成为比海洋更便捷的力量投放途径。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纵深的岛国，除非它的空军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获得绝对优势，否则很难承受与大陆国家的对攻。所以，只要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不大幅度落后于日本，日本就难以取得对中国的海空优势。

在1840年之后，对中国的威胁来自所有方向：东北方是日本和俄国；东部海岸是英、美、法、德、日、意、奥等所有东西方列强；西南有法国和英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整个北方边境都曾面临俄国（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并被夺走了大片的领土。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外部威胁同时来自四面八方，这却是20世纪中国的处境，所以有瓜分豆剖之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威胁还来自空中，美国和苏联都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今天中国仍然面对类似的局面，为有核国家所包围。一些邻国谈不上敌视中国，但心怀疑虑或不满，或明或暗防范中国。在中国的所有邻国中，很少有哪个国家希望中国强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强国为邻。如果有可能，它们更愿意自己做老大。例外是那些需要中国帮助它们抗衡另外某个强国的国家。中国招惹邻国担忧是很正常的，无论中国多么克制。大国的举动会在邻国引起强烈反应，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全世界都在观察美国的一举一动，不停地猜测和猜疑。

中国的“中国”位置容易受到遏制。“遏制”是乔治·凯南提出的对苏政策。英语是contain，它的含义似乎没有汉语的“遏制”那么咄咄逼人。在汉语的语境中，“遏制”常常被用来描述险恶用心和武装扼杀。其实，“遏制”是积极防御的措施。Contain就是限制一个国家的势力，不让它来危害自

己的利益，而不是绞杀对方。但是，遏制政策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绞杀、扼杀。这很像围棋的对弈，高手布局是为了争夺空间，不是要吃掉对方的棋子；但是只要有好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对方一块棋。在国际政治层面，苏联解体就是西方遏制的结果。

虽然有三个大国的环绕，中国的地缘环境没有像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样局促，因为印、俄、日三大国的力量都有限。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把印度和中国分开，中国从东到西都占有制高点；俄国的重心在它的欧洲部分，目前多处受到挤压，没有足够的力量东顾；日本受制于美国，目前是和平愿望所主导的国家，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这样，单独面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中国都不处于劣势。如果中国不犯严重的战略错误，这三个国家（或其中任意两个）也没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况且，中国在本地区并非没有朋友，这些友邦可以抗衡任何潜在的反华结盟。所以，中国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国内。凭借中国的巨大规模，只要在国内实现了自由与繁荣，任何来自国外的挑战都不足以构成重大威胁。

中国一般被泛称为东亚国家。其他东亚国家都有更精确的地理定位，如日本是东北亚国家，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以中国之大，不可能以某一个角落来确定其地理位置。中国在地理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东北在东北亚，新疆在中亚，内蒙古在北亚的南缘，西藏的南部在南亚，云南、两广、台湾和海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中国的其余部分才是东亚。这种划分不是字面游戏，中国的国土确实分别属于不同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区域。这些区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中国有必要建立各区域在国内的“地缘战略中心”，更好地辐射中国对各区域的影响。贫穷的边境省区和边境城市不可能对邻国产生吸引力。

中国应该通过实力增长来改变“力量平衡”或均势，使之有利于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队不会取得对其他地区大国的明显（下转第55页）

电磁辐射——新的致病源

刘国信

电磁辐射无处不在

众所周知，任何电子、电器设备在运行时，都必然会在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强度的电磁能量，它们都可以产生各种形式、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电磁污染源。电磁辐射，就是一种从电磁源向外发出电磁能量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中能够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种类和数量都在大幅度增加，电磁辐射可谓是无处不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已经置身于一张辐射网中。

据专家介绍，目前电磁辐射源大致可分为公共电磁辐射源和个人生活电磁辐射源。其中公共电磁辐射源包括：变电站、移动电话基站以及遍布城市的地铁、电车和电气化列车等；而个人生活电磁辐射源主要是指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离不开的电子电器产品，如微波炉、电磁炉、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电脑、手机、电话、现代办公设备等。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球每4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在我国；同时，我国还拥有3亿台以上的电视机、4亿台以上的电脑，我国每年新增的微波炉超过一亿台……这些产品和设备都在向生活在周围的人们传播着不同波长和强度的电磁波，导致生活环境中的电磁环境总量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电磁辐射成为新的致病源

电磁辐射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不占空间，也不留痕迹，更不易被人感知，但它可以穿透包括人体在内的多种物质。人体如果长期暴露在超过安全的辐射剂量下，细胞就会被大面积杀伤或杀死。如今，电磁污染已被公认为继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之后的第四大公害，电磁辐射已成为当今危害人类健康的致病源之一。

大量研究显示，当肌体过多或过久地暴露于电磁辐射的环境中时，就会“受激”产生不利的生物效应，出现急性损害或慢性损害。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高强度的电磁场中，容易诱发神经功能紊乱、激素分泌异常甚至诱发白血病、癌症等严重疾病。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发育组织的生理活动十分活跃，所以对环境电磁辐射更加敏感，更容易受到电磁辐射的危害。

此外，高剂量的电磁辐射还会影响及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物电流和生物磁场，使人体内原有的电磁场发生异常并影响到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功能，表现为心悸、失眠、女性经期紊乱、心动过缓、心搏血量减少、窦性心律不齐、免疫功能下降等。最新研究显示，手机辐射还与失眠、老年痴呆症、儿童行为问题、男性不育等有密切关系。

减少电磁辐射有章可循

有关研究显示，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影响的家用电器，按照危害程度排序分别是：微波炉、电磁炉、手机、电脑、子母电话机、无线对讲机、电热毯、配电箱等。不过，电磁污染只有在电磁辐射超过一定强度（即安全卫生标准限值）后，才对人体产生负面效应。

根据国家在家电辐射的相关标准，只要小于12伏/米，家电的电磁辐射就达标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电磁辐射不必过于紧张，草木皆兵，只要学会主动防护，就可以大大减少或尽量避免电磁辐射造成的危害。

别让电器扎堆。不要把家用电器摆放得过于集中或经常一起使用，特别是电视、电脑、冰箱不宜集中摆放在卧室里，以免使自己暴露在超剂量辐射的危险中。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11 亿 其生存发展面临六大问题

2009 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 2.11 亿，平均年龄约为 27.3 岁，由于分布、结构、素质复杂，其生存发展面临 6 大问题，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提供的信息。

该报告显示：

流动人口中 78.7% 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其中 20 至 44 岁占被调查人口的 2/3，14 岁及以下儿童占 20.8%，男性占 50.4%，女性 49.6%。流动人口家庭平均规模为 2.3 人；16 至 59 岁人口中 86.8% 接受过初中教育，人口月平均收入 1942 元人民币。其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报告强调，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 6 大问题是：

——高中及以上学历失业比例高，小学及以下学历失业时间长，就业技能培训针对性不强，两者在城市产业升级过程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收入较低，限制其社会保险参保率，约

束其在城市消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的农业流动人口中，仅有 11.6% 参加了养老保险。

——劳动权益维护能力差，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低，约三成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时间偏长，平均每周工作 58.2 小时。

——社会保障现状不佳，仍有 39% 的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只有 23.4% 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工伤保险，超过一半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

——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异地报销困难。患病后去流入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者不到 70%，近一成选择回老家治疗。仅有 26.8% 已参加医保流动人口表示可部分报销医疗费，超过六成仍需全部自己支付。

——流动儿童入读公立学校比例较低，大龄儿童在流入地完成义务教育存在困难。正在上学的流动儿童中，在流入地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仅为 69%，学籍管理制度是影响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

（摘自 2010 年 9 月 10 日〈中国新闻网〉）

与电器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般只要摆放在离人经常逗留处 1.5 米之外，就能大大降低对人体的损害；手机充电器在充电时应该与人保持一定距离，尤其不要放在床头；手机在使用时，应尽量使头部与手机天线的距离远一些，最好使用分离耳机和话筒接听电话。需要注意的是，孕妇更应远离微波炉、静电复印机以及高压输电线、变电站等。

缩短电器使用时间。看电视、用电脑时，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使用电吹风时，尽量远离头部，不要连续长时间使用；尽量少用或别长时间使用手机、电热毯、理疗机之类与身体接触较为密切的

电器。

保持家居空气流通。生活中，加强房间通风是减少电磁辐射、避免发生电磁污染最为简易实用的有效方法，因为在密闭的环境中，电磁会使空气中的电离层分离，很容易吸附在人的皮肤上，从而危害健康。

使用防辐射产品。长期在高强度电磁场中工作的人员、经常接触和操作电脑者以及老人、儿童、孕妇等对电磁辐射敏感的人群，配备防辐射服、防辐射屏等防辐射产品，对减少电磁辐射伤害，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摘自 2010 年 9 月 1 日《中国劳动保障报》）

全国闲置土地 16.95 万亩

国土资源部 8 月 19 日在京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房地产用地专项整治工作。截至 5 月底，全国共上报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宗数 3070 宗，面积约 18.84 万亩。其中，闲置土地宗数 2815 宗，面积 16.95 万亩；保障性住房用地改变用途宗数 92 宗，面积 1257.85 亩。

从清理数据来看，在各类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中，闲置土地成为房地产用地违法违规的主要问题。各地上报的 2815 宗闲置土地中，因毛地出让拆迁难、调整规划等政府和客观原因造成闲置的约占六成以上。从闲置土地分布来说，东部地区数量较多，分别占上报总宗数和面积的 62.24% 和 62.46%。从闲置时间上看，闲置 5 年以下的地块 1354 宗，闲置时间 5 年以上的地块共 875 宗，闲置时间较长，但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开工时间的地块 586 宗。

截至目前，全国已开展查处的各类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共计 2208 宗，总面积约 13.25 万亩。其中，闲置土地 2044 宗，面积 12.35 万亩；别墅用地 74 宗，面积 7836 亩；保障性住房用地改变性质 83 宗，面积 943 亩；违法违规转让 7 宗，面积 290.04 亩。

（摘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197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召开会议，评审世界文化遗产。截至 2010 年 8 月 1 日，中国已有 40 处世界级物质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26 处，世界自然遗产 8 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4 处，文化景观 2 处。

【文化遗产】(26 处)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湖北明显陵、河北清东陵、清西陵、江苏明孝陵、北京十三陵、辽宁盛京三陵）；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自然遗产】(8 处)

九寨沟；黄龙；武陵源；三江并流；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三清山；中国丹霞（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茆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

【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 处)

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武夷山。

【文化景观遗产】(2 处)

庐山；五台山。

【记忆遗产】(5 处)

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朝内阁秘本档；清代大金榜；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26 处)

昆曲；中国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剪纸；中国雕版印刷；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

2006 年 6 月，国务院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出通知，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白蛇传传说、阿诗玛、苏州评弹、凤阳花鼓、杨柳青木版年画等共 518 项。此后，2008 年 6 月又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 510 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 147 项）。

（摘自 2010 年 9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党政干部参考》载文统计分析

《党政干部参考》(以下简称《参考》)是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主办、面向党政干部读者、全国公开发行的文摘性刊物,其前身是《党政干部文摘》,始创于1991年,2010年为更加凸显办刊宗旨——让读者从阅读中学到所需,悟到真理,指导实践,更为现名。20年来,《参考》征订数量稳定上升,成为文摘类期刊中的名品,其内容已被龙源期刊网和中央党校网全文收录。

为与时俱进,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务实的文风,把党校姓党的原则落到实处,更好地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服务,现对《参考》的载文情况做一个尽可能全面而科学的分析和考量。

综合分析《参考》近5年(2006年初—2010年7月)所有载文和龙源期刊网“网络传播年度数据报告”,可以发现《参考》读者定位明确,办刊特色鲜明,具有优秀文摘刊物的一般特性和自己的独特性。具

体而言,《参考》具有广泛性、理论性、品质性、时效性、可读性和资料性。

一、广泛性

《参考》文章的选编来源:以中央党校图书馆为平台,经过对众多图书和报刊资料反复比较最终锁定在60余种国家一级报刊,并以人民网、新华网、中直党建网等10余个国内权威网站的材料为对照参考。所设栏目内容广泛,信息收集从时事政治到理论研究、从社会问题到国防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外、从最新书摘到历史典籍,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近5年来,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从读者需要出发,《参考》先后设置过41个栏目,按照栏目载文量占每期载文总量的比率排序,前20位的有“要论”、“高层言论”、“学习与研究”、“信息窗”、“百家言”、“经济纵横”、“反腐倡廉”、“数据库”、“农业·农

(上接第51页)优势。欧亚大陆各国将保持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并受到美国的操纵。一个国家的大动作将招来其他国家的反制,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美国扶持的国家和打压的国家又有不同,后者的活动余地更受限制。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多了一个制约因素,那就是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对外贸易的设计、原料和市场都在外面,受外部制约自不必言。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大大减少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

现在中国太多地关注“崛起”问题。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刻意追求,也没有必要热烈讨论。未来不可预测。只要中国发展,影响力

和势力范围自然会扩大,进而改变地区乃至全球均势。为了维持这样的自然过程,中国首先需要确保竞争力、国内的公平与正义,以此带动军力的增加。到时候,任何遏制中国的防线都会不攻自破。如果经济崩溃——苏联是一个前车之鉴——遏制就会步步紧逼。中国宛若一棵树,终将生长得根深叶茂,任何阻挡她的顽石都将被挤破。这个过程未必需要直接的暴力对抗,均势的改变可以是一方力量相对增加,不一定是一方打败另一方。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摘自《地缘大战略——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丁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村·农民”、“共同关注”、“观察与思考”、“热点聚焦”、“环球瞭望”、“最新书摘”、“文史苑”、“社会扫描”、“他山之石”、“海峡两岸”、“军事天地”、“国际政治与经济”。

《参考》的广泛性不是无原则的广泛。它博采众家，而又有所取舍，舍弃偏离主题定位或内容空泛之文，注重选取那些少水分、有干货、目标读者群期待的精华文章。总之，通过编辑人员的努力，《参考》做到了内容丰富而又主题明确、取材广泛而又博中有精、观点多样而又风格统一，很好地体现了办刊宗旨。

二、理论性

为实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全国各级党政干部的理论水平的任务，《参考》以理论性、思想性为基本定位，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其庄重、实在和现代三位一体的内在特质。

“要论”、“学习与研究”、“经济纵横”、“百家言”等栏目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既能集中及时地传递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声音，宣传特定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能兼收并蓄，展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观点和诉求，因而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作用。如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和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历史时刻，《参考》都及时汇集相关研究单位和专家的精彩文章，开辟专门栏目，全面深入地报道、分析，帮助读者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央的决策精神和重大战略部署。

龙源期刊网《网络传播数据报告》显示，《参考》的理论性栏目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和热爱。其中，国内读者更关注重大决策及其理论解读、执政队伍建设、社会热点评述等内容。如表1所示；国外读者则更关心我国的经济建设、三农发展、社会问题、高层动态等内容。如表2所示。

表1. 2006年—2010年7月国内网上访问量前五名栏目

| 栏目 名次 \ 年份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1-7月) |
|---------------|-------------|-------|-------|----------|-------------|
| 1 | 要论 | 学习与研究 | 百家言 | 学习与研究 | 学习与研究 |
| 2 | 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 要论 | 信息窗 | 百家言 | 要论 |
| 3 | 百家言 | 百家言 | 要论 | 农业·农村·农民 | 百家言 |
| 4 | 社会扫描 | 反腐倡廉 | 反腐倡廉 | 要论 | 为政之道 |
| 5 | 反腐倡廉 | 经济纵横 | 观察与思考 | 经济纵横 | 经济纵横 |

表2. 2006年—2010年7月国外网上访问量前五名栏目

| 栏目 名次 \ 年份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1-7月) |
|---------------|----------|-------|-------|--------|-------------|
| 1 | 经济纵横 | 经济纵横 | 百家言 | 学习与研究 | 经济纵横 |
| 2 | 农业·农村·农民 | 百家言 | 反腐倡廉 | 热点聚焦 | 农业·农村·农民 |
| 3 | 社会扫描 | 观察与思考 | 观察与思考 | 高层言论 | 要论 |
| 4 | 信息窗 | 反腐倡廉 | 高层言论 | 干部队伍建设 | 反腐倡廉 |
| 5 | 要论 | 要论 | 经济纵横 | 百家言 | 热点聚焦 |

三、品质性

好文摘里有哲学。文摘是否有好品质、好气象直接影响读者的感受和印象。如同人们看到质量迥异的两件产品一样。当今社会，信息量极为丰富，这虽然为文摘类期刊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空间，却也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因此，信息汇总、鉴别、筛选、整合就是文摘编辑人员必须做好的工作。

《参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章选材上，从受众需要出发，追求深度、广度，注重有灵魂、有意蕴、有品位之作。在文字处理上遵循层次清楚、语言简练、信息含量高的原则。其目的旨在打造深受读者喜爱的信息交流平台。为此，《参考》坚持汇集权威研究机构、权威人士之作。如，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和石仲泉、吴敬琏、林毅夫、王蒙、余秋雨、郑欣淼、葛剑雄等权威大家的文章。这些权威文章观点明确，逻辑清晰，文风朴实，读后可令读者开阔视野，各有所获。

可以这样说，《参考》通过摘英撷华，保持高品质，融入到读者学习——领悟——收获的全过程，践行着自己的办刊初衷——读者从中学习到东西，领悟到东西，从学习到领悟的过程，参考就在其中。

四、时效性

《参考》从创刊之日起，就将新、快、准作为基本要求，充分展现了信息汇编的时效性。如，“百家言”栏目主要汇编针砭时弊、态度严肃、语言精辟、有理论、有见地的时文；“热点聚焦”及时报道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事件和时事热点；“经济纵横”、“社会扫描”等栏目则及时跟踪中央的重大决策，报道过汇率改革、分配体制改革、西部开发、政府信息公开化等热门话题。

在做好全面跟踪重大问题的同时，《参考》还注重把握新事物的主流性与先进性。如《新疆阿勒

泰地区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文在《法制日报》刊登后，《参考》立即进行摘编，并添加“编者按”推出，以昭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的有效性，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和网络点击率。

《参考》求快的同时，还认真筛选那些观点独特，角度新颖的精品文章，准确把握不同领域的理论与现实动向，推动读者认识的提高。

五、可读性

《参考》坚持以主题策划的方式创造性地集纳不同角度、不同来源反映同一主题的文章，既坚持了一元化的价值主导，又兼听多方声音；既有新颖的信息动态，又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坚持了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既完成了信息汇集的任务，又活跃了读者的思维，有极强的可读性。如《参考》既有“学习与研究”栏目中党的建设科学化、建设学习型政党、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主题报道，也有“百家言”栏目中有关领导文风、会风、工作作风等议论性文章，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既有明确主题的权威报道，又有多元观点的信息大餐。

为了读者阅读的连续性，《参考》还注重通过对反映新观点、新问题的文章加“编者按”和“相关链接”等方式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如在“医疗体制改革”专题之后附加“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体系架构”等链接，增加了《参考》的技术含量，提高了读者对这些专题深入全面的了解，提升了读者阅读的连续性。

六、资料性

《参考》因选文全面，规范，覆盖面广，又是主题式报道，所以为一定时期中相关政策、理论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查阅线索，具有极强的资料性。统计显示，近5年“信息窗”、“数据库”等栏目共收入政策信息、权威统计数据321条。多年来，时常有新订户要求补齐往年杂志作为资料保存的现象出现。

（作者：史小平 闫荣舟 周慧）

岁月的眼泪

韩传栋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站在滚滚东去的河岸上，发一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生命的浩歌从此进入悲壮、平静的岁月，不再一步三唱，不再溢美时空。岁月的沧桑，像西天的一抹斜阳，又如东去的滔滔河水，在思想者的心中掀起无尽波澜。岁月就这样匆匆而去了，永不回头地去了。

匆匆岁月，走过秦汉，走过盛唐，走过颓宋。幽州的秋风，吹动着陈子昂的衣袂，南飞的雁阵又给诗人心中平添几许悲凉，于是那千古悲歌诞生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是铺设在整个宇宙间的大悲凉，又是莽莽苍野，千里白云，万里秋风，在诗人心中的折射。至此，历史的天空不再晴方日好，花团锦簇。一切具象的骏马秋风，天苍野茫都难以言其千分之一。可就在这大悲凉的朔风秋韵里，华发遍染的白居易，闻得琵琶一曲终，泪湿青衫涕染心。而饱受战乱之苦，历经岁月沧桑的杜甫又不能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岁月的脚步浩浩荡荡地从远古走来，又一路逶迤地向历史的纵深处走去，每当国将不国之时，便凸显我们这个民族坚挺的底色和不屈的意志。面对崛起在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大举进犯，精忠报国的岳飞，抬望眼，仰天长啸：还我河山！但最终39岁的岳飞被赵构秦桧害死在风波亭上。可那“还我河山”的浩歌，何尝不是大英雄椎心泣血，报国无门的绝唱。

草木枯荣，江河呼啸，岁月的脚步一路向我们走来。嗒嗒的马蹄声踏破了卢沟桥的寂静。惨无人道的屠杀被日本人耍到了极致。1937年7月28日，如血的太阳旗飘扬在北平如血的夕阳里。梁实秋先生一边抚摸长女文茜的脑袋，一

边涕泪滂沱地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尽管此后的梁先生隔海北望，寿终台北。但断鸿声里的那一声悲叹，显示着他华夏子孙的一片冰心！

人如潮，歌如海，炮如雷。1949年10月1日，历经沧桑的天安门城楼上，人民领袖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人们的热泪飘洒在十里长安街的金风里，领袖的眼泪抛洒在天安门的金风里。“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流吧，尽情地流吧！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的自豪的泪，幸福的泪。

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杨振宁在美国听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邓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上海赶到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地到洗手间去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桃红柳绿，浪飞潮起。走在一弯浅峡边，望着那白鸥翩跹，诗人余光中泪眼朦胧地边走边吟：“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这就是血脉的泉源，思想的图腾，人格的标高。这就是根，这就是魂，这就是凛凛岁月里的点点泪花，如金如玉，如练如雨……